

## 棄國還鄉： 砂拉越華人國族認同之頓挫（1959-1974）

羅烈師\*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陳敏萱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碩士

砂拉越左翼的人民聯合黨成立的1959年，一位來自17哩平凡而意氣風發的青年入黨，隨後被捕，至1974年和平協議終於讓牢裡的青年低頭，無奈失望地拋棄那「華人做頭」的砂拉越國族想像，回到17哩的家鄉。本文聚焦於參與及經歷新村往事之地方人士心情之轉折，察覺其砂拉越國族認同儘管頓挫，但仍然牽動著砂拉越與馬來西亞之間的微妙關係。全文依順敘法，先簡述聚落史，其次描寫故事主人翁1960年代的反殖與反大馬地下武裝運動及被捕入獄的過程，再其次說明武裝運動所導致的強迫遷入新村並隔離的生活；最後則以17哩等新村後來的發展反視反抗者此刻依舊澎湃卻也滿腹無奈的矛盾心情，並據此討論砂拉越華人國族認同之頓挫與遺緒。

關鍵字：砂拉越、馬來西亞、國族認同、新村、華人、客家

---

\* E-mail: ls.lo@hkc.nctu.edu.tw  
投稿日期：2015年08月04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6年03月14日

## **Abandoning State and Returning Hometown: Frustration Shaping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Sarawak Chinese (1959-1974)**

Lieh-shih Lo\*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Min-hsuan Chen

*Master,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A spirited young man from the 17th Mile was arrested immediately after participating in the anti-colony and anti-Malaysia movements and joined the left-wing 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 founded in 1959. Finally, the iron spirit abandoned his ideal imagination of Sarawak national identity, and came back home in New Village and became a fade farmer or merchant when the Peace Agreement (Operation Sri Aman) was signed by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and Communist guerrillas in 1974.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hanging attitude of the villagers who attended or experienced the communist

---

\* Date of Submission: August 4,2015  
Accepted Date: March 14,2016

history of the New Village, finds that even though the Sarawak national identity was frustrated; it still affects the relation between Sarawak and Malaysia.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n introd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17th mile New Village. It then moves to the villagers' narrations about the anti-colony and anti-Malaysia movements, and the cage life in New Village. In the final part, it represents the frustration and lingering affection of the Sarawak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Keyword: Sarawak, Malaysia, National Identity, New Village, Chinese, Hakka

做自己工囉，就好像一個傻瓜樣子囉！什麼都不理！每天就是跟妻子一起到園裡做工囉！店裡也幫忙做囉…這樣子就是做平常的一個人了…什麼東西都忘掉它、不要管它了。因為那時候是已經很失望了…怎麼可能不失望？搞到這樣久、這樣多年，付出這麼多心力，後來一點利益都沒有，反而還害到家裡的人。害到自己的太太、兒女，讓他們沒人照顧，那時候自己也是很內疚啊！（黃爺爺 2013）

## 一、噤聲與遺忘

那是華僑、華人、馬來西亞華人、砂拉越華人等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混沌的最後時刻，起初華人的墓碑與廟宇匾額還刻著光緒或民國年號，但是砂拉越的統治者是白人建立的王朝，又經短暫的日本侵略後，大戰平靖，殖民地紛紛獨立的時代，砂拉越居然反而變成英國的殖民地。於是長期默默耕耘的左翼思想勃發，砂拉越解放同盟（1953-1965）成立了，「砂拉越獨立」與「華人做主」，在共產新中國（1949-）崛起的當口，成為年輕人震天軋響的理想口號（陳偉玉 2010：61-64）。而那最初，馬來王朝也不過是半島上的殖民地罷了，豈料幾年光景，卻跨海而來，成了馬來西亞聯邦（1963-）的共主。<sup>1</sup>從此，就算華

1 馬來聯邦（1895-1946: Federated Malay States）是大英帝國在馬來半島的殖民政體之一，由半島上雪蘭莪、森美蘭、霹靂和彭亨四個馬來王朝共同組成，首府為吉隆坡。至1946年，馬來聯邦與海峽殖民地（不含新加坡），再加上玻璃市、吉打、吉蘭丹、登嘉樓和柔佛等馬來屬邦，在英國政府管理下，組成馬來亞聯邦（Malayan Union）；之後再於1957年獨立；並於1963年又聯合新加坡、砂拉越與沙巴，組成馬來西亞聯邦（顧長永 2009: 5-18）。

人的國族認同仍然擺盪、抗爭或折衝，以馬來人為中心的馬來西亞國族認同建構，終究成為國家發展的主旋律（Shamsul 2001; Skeldon 2003: 63; 楊詩評 2006: 128-133; 陳偉玉 2010: 192-193）。在砂拉越國族認同曇花一現的大歷史裡，1959年17哩客家小鎮平凡而意氣風發的青年加入了左派的人民聯合黨，投身地下武裝獨立運動而被補，1974那一年的和平協議最終讓牢裡的青年低了頭，無奈失望地拋棄那「華人做頭」的砂拉越國族想像，回到了鐵絲網環繞且改名為新生村（Siburan）的17哩家鄉，「就好像一個傻瓜樣子」地「新生」。

這是一個聚落的「新村往事」，新村係1940年代英國殖民政府為斷絕同情武裝共產主義者之隔離措施，整個馬來西亞有四百至六百處這樣因共產地下武力事件被迫集中而產生的聚落。長年以來，隨著馬來西亞整體社會經濟的變遷，新村也發生結構性轉變。新村五十週年時，已有關於整體新村的空間分布、歷史背景、社會文化、教育及生活水準，乃至未來發展與改進建議的論著（林廷輝與宋婉瑩 2000）。相對於此，後進的年輕研究者敏銳地察覺眾多新村在地理位置、背景、人群組成或經濟生活等，存有極大的個別差異。一般人對於新村的歷史圖像呈現兩種極端，一者為官方的殖民立場，凸顯新村硬體的完備以及剿共的績效；一者為住民觀點，撫弄過去的傷痛，放大新村的弱勢（潘婉明 2005: 196-197）。有見於此，後進研究者各自以個別新村之田野調查，針對文化景觀、工商業發展、人群遷移等面向的變遷或發展，提出更細緻的觀察紀錄（潘婉明 2005；鄒雁慧 2008；古燕秋 2011）。甚至逕自視新村為一般聚落，討論女性婚姻與信仰儀式等在當代社會的變遷（蔡靜芬 2013）。

後進研究者之提醒吾人不可以視「馬來西亞新村」為一相似、共同、甚至單一的社會文化現象，其敏銳感確實合乎馬來西亞建國以來，華人社會逐漸加深的在地認同趨勢。實際上，這種從單一的華人觀點，轉而注意不同地區華人的個別特殊性的態度，已表現在馬來西亞政府政策。2004 年政府即倡議以 ABC 三等級體檢新村的社會經濟概況，藉以較為妥適地謀求改善新村處境。十年過後，馬來西亞經歷了社會政經重大發展，三等級劃分法已不符新村現況，此刻應該採取更適切的指標，建立更貼近現況的分級架構，重新分類新村（Chin and Chang 2015）。

這種從共產新村到一般聚落之社區發展的研究進程轉變，正彷彿 1974 年青年回歸新生村之登音迴響，只是當時青年的義憤與無奈，已然為社會所漸漸遺忘。這種遺忘不難理解，它源自整個世界的冷戰。砂拉越新村之成立，晚於馬來半島，1963 年馬來西亞聯邦成立時，砂拉越當地反馬力量與印尼當時的親左蘇卡諾（Soekarno）政權互為表裡，當共產地下武裝勢力在砂拉越 17 哩起事後，馬來西亞採取的「鐵鎚行動」（Operation Hammer）以及後來在新村的管制計畫，實際上皆源自民主與共產兩大陣營的冷戰世界（Poritt 2002）。造成遺忘的原因，正是國際冷戰下，政府對於新村往事的立場（Yong 2006, 2013）。Yong 在新村田野調查期間，發覺新村人並不喜歡跟他提起異於官方論述下的記憶，所餘僅是傷心難過，這使得那段應該是刻骨銘心、熟悉不過的遷村往事，卻在新村宛若「噤聲」（Yong 2006）。關於真實事件的記憶與歷史，往往不相符。大部份新村人對於自己過往的鬥爭往事顯得事不關己，彷彿只是曾經發生的事罷了；實際上，他們都曾為之受苦。而這就是冷戰政治經濟對這群客家人的意義，他們當年曾經因這冷戰禮物經濟

的漫天暴力而犧牲，此後，卻又必須與之持續共處（Yong 2013: 28）。Yong 所謂冷戰禮物經濟多少語帶諷刺，西方世界在冷戰期間以發展及反共名義，在砂拉越耗費龐大人力與物力，可以視為一場馬來西亞國家菁英無可償付的誇富宴（potlatch）。於是馬來西亞不得不付出極高的代價，遑論犧牲。這代價即為其後新自由資本主義控制下，無盡的現金作物經濟發展；而被集中的新村客家即為犧牲（Yong 2013: 18）。顯然，吾人關切各地新村之個別差異時，共產往事在新村居民心中留下的刻痕，不應遺忘。只是對 Yong 而言，他花了功夫討論造成結構性遺忘的原因與歷程，並對新村客家居民寄予深切同情。

在 Yong 正要出版砂拉越客家專書之時，陳敏萱於 2013 年住進 17 哩前後半年，根據當事者的訪談，挖掘了這段青春往事。不同於 Yong 對砂拉越新村噤聲與遺忘的理解，陳文發現遺忘的是年輕人，但長者則顯然熱情依舊（陳敏萱 2014）。本文以陳文為基礎，濃縮並聚焦於參與及經歷新村往事之地方人士心情之轉折，察覺其砂拉越國族認同儘管頓挫，但餘火未燼，仍然牽動著砂拉越與馬來西亞之間的微妙關係。下文依順敘法，先簡述聚落史，其次描寫故事主人翁 1960 年代的反殖與反大馬地下武裝運動及被捕入獄，再其次說明武裝運動所導致的強迫遷入新村並隔離的生活；最後則以 17 哩等新村後來的發展反襯反抗者此刻依舊澎湃卻也滿腹無奈的矛盾心情，並據此討論砂拉越華人國族認同之頓挫與遺緒。

## 二、1934·椒園

砂拉越華人的歷史可追溯到 19 世紀，當時砂拉越政局紛亂，於是在 1841 年原本由汶萊所統治的砂拉越，便被汶萊蘇丹割讓給英國的布魯克家族，並封詹姆士·布魯克（James Brooke）為「白人拉者」（White Rajah），而在砂拉越開啟了長達一百年的統治（陳鴻瑜 2012；Chang 2008）。在其統治期間，拉者為了要促進當地貿易，於是鼓勵華人移入砂拉越進行開發、採礦，而這些華人又以客家移民居多。再者，由於砂拉越古晉南部的石隆門（Bau）盛產金礦，所以來自中國的採金華人多移入此地。再加上 1850 年中國的太平天國起義後，許多失敗的群眾多往南洋逃亡，致使石隆門一帶成為一個中國人為主的或華人為主的村落，且採取自治、不受政府管制。因而在 1857 年白人拉者決定加強對當地的控制，而與當地華工爆發激烈衝突，為著名的石隆門礦工事件（St. John 1863: 162-163；劉子政 1996；饒尚東 1995）。

在這件事之後，雖然對布魯克家族產生衝擊，不過後來其仍然繼續拓展領土，並對砂拉越穩定持續統治。直到 1941 年，二次大戰期間，才被日軍佔領了砂拉越三年，但隨著國際局勢的轉變，日軍在太平洋戰事上失利，也連帶的影響了砂拉越當地的社會狀況，讓戰後的砂拉越滿目瘡痍。布魯克家族因無法負擔砂拉越戰後的復原工作，所以決定將砂拉越讓渡給英國，讓英國從間接統治轉為直接統治（陳鴻瑜 2012；于東 2009）。砂拉越華人在日本統治期間，興起過一波波的抗日運動；二次大戰結束，砂拉越卻重回英國人手中，於是抗日力量轉而反殖，嚮



往脫離英國，建立自己的國家。

其實早在 19 世紀末葉，金礦枯竭後，客家人已前來古晉地區改行種植農作物（周丹尼 1990：15）。至廿世紀 40 到 50 年代，戰後胡椒缺乏，供不應求，古晉到西連的成邦江路<sup>2</sup>上 15 哩至 25 哩處有幾塊區域，土質肥沃又平坦，適宜胡椒的栽種。隨著胡椒價錢不斷上漲，許多華人也紛紛攜家帶眷到這裡開闢新生活，使得短短兩年間，當地的人口瞬間激增，華人聚落也應運而生（杜明 2008）。

就是要往義山的那條路，以前叫做石山路，上面有個大石山，開採石頭的，石山路那邊以前很多外地的人來這邊種胡椒。這邊這條路一直通到 18 哩，有一條義山路，那邊進去通到八督港，華語叫做新漁港。可能就是這邊很多人在這裡種椒，他聽來聽去…就想說這個地方好還是什麼的，因為很多華人聚居在這邊。海外（古晉近海郊區）的也上來…其他什麼地方的人也搬來這邊種椒，所以我爸爸也搬到這邊來囉！（溫爺爺 2013）

---

2 從古晉通往西連的道路舊稱晉連路，待道路貫通至成邦江（斯里阿曼）後，則改稱成邦江路。



圖 1 砂拉越新村及相關聚落位置圖

資料來源：依 Google Earth 底圖加註

成邦江路沿線大約可分為幾個以商店區為聚集的華人聚落，分別是 15 哩、17 哩、19 哩、21 哩、24 哩。<sup>3</sup> 下文依照時序，參考杜明（2008）的文獻整理成果，並以村落村民的口述訪談補充，敘述如下：

最早的華人聚落 1934 年出現於 24 哩，在陸路尚未開通前，華人取水運之便，在路橫港（後改為西林河 Sungai Sirin）建立聚落。由於華人人口增加，店鋪隨之產生，至 1950 年代時，已有 18 家商號，並有水口伯公的地方信仰、慈善會社組織以及中華公學。

其次為 19 哩，在二次大戰前，成邦江路 19 哩處有一條通往原住民

3 這一哩程係以古晉市中心為起點計算，哩程數本身就成為地名，例如「17 哩」就比「新生村」或 Siburan 更為一般人所習用。

聚落的小路，路口即有兩間華人商店。1947年創立了19哩中華公學，可見已有不小的聚落。1952年英國殖民政府在成邦江路最初兩家店舖的對面，也興建了六間商店，而成為小型市集。在1960到1965年期間，19哩中華公學的學生總人數都達到了150名以上。

再其次是17哩，成邦江路路旁的17哩大約在1942年以前即有幾間簡陋的華人店家，隨著舉家遷移來當地種胡椒的人逐漸增多，店家也在路旁增加到12間店。1952年英國殖民政府也選擇在此進行城鄉發展計畫，在當地又興建了六座U字型的雙層木板店屋；同年，當地商人在17哩經營戲院。到1957年後，因18哩店屋的火災，原本18哩的商家搬到17哩後，使得17哩的店屋到當時已達到40間之多。之後警察署、農業部與診療所等陸續設立，成為地方行政中心。當地人口聚集後，地方人士籌設「古晉成邦江路聯合慈善社」與「古晉西連路互助社」等慈善組織。換言之，在新村成立以前，17哩除了種椒業發達外，也成為成邦江路上商業發展最蓬勃的小鎮。

又其次是21哩，日本軍隊佔領砂拉越三年八個月期間，選擇了21哩做為補給的重要基地，大量的招募工人到此地來耕種作物，並興建了大型建築物，以供後勤所需。1945年日本戰敗後，來自各地的工人部份留下，部份離開。當地雖然失去過往的熱鬧，但日本所留下來的建築物，被當地華人開闢為店面，做起生意。原本散居在附近的華人，得知本地土質肥沃，適宜種椒，便又恢復為人口密集區。如同24哩擁有水口伯公的地方信仰，在21哩也有一個中央伯公為當地信仰中心。

最後為15哩，15哩聚落也是華人戰後所聚居而成，沿成邦江路路旁興建了20間商店。15哩因距離古晉較近，所以這個聚落除了客家人

之外，還有潮州人居住於此做生意。據從前居住在 15 哩的村民陳先生口述，20 間商店中，客家人和潮州人各占一半；郊區居民則為務農的客家人或原住民，商店區附近的永真宮（真君大帝廟）成為地方信仰。

聚落形成之後，隨之面臨了小孩的就學問題。1940 年到 1965 年間，在這個區域內曾經陸續有六所華人小學、一所中學成立，分別為 15 哩、17 哩、19 哩、21 哩、24 哩的中華公學、17 哩中華公學巴都港分校，以及 17 哩民眾中學。這幾間學校都是當地華人農民考量到自身子女就學不便，於是在鄰近聚落各自籌款所設立。而老師則招募從中國移居來砂拉越的教師，這些教師除了帶來中國的文化與教育，同時也將當時新中國成立的思想傳進砂拉越，使得這些農村的孩子，接收到不同於以往的新思維，而深受影響，甚至因而獻身於革命。

### 三、1959·禁錮的熱血

抗日反殖的力量紮根在古晉郊區，這群客家華人從小受到來自中國教師左翼思想影響，於是使得尋求獨立的力量包裹著深重的共產外衣，儼然就像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初始地的小延安（于東 2009；盧友愛 2012；林煜堂 2009）。許多農村青年，紛紛投身左翼運動，參與地下組織。而這個區域內的華小、中學，也在地下成立了許多學習小組<sup>4</sup>與歌詠隊<sup>5</sup>，做為之後參與武裝鬥爭的人力。除了青年之外，在當地許多老

4 學習小組為當時學校課程外的課餘社團，也是當時左翼運動在校園中的地下組織。主要會在課後時間共同研讀與討論共產黨、左翼運動相關之書籍，同時這裡也是培養左翼幹部的重要社團之一（參見下文）。

5 歌詠隊是活躍於當時鄉村年輕人的娛樂性社團，也是左翼組織的一部分。主要活動內容雖為唱歌、跳舞等等聯誼活動，但歌曲內容還是以左翼相關歌曲為主。參與者在之後也多數會成為左翼運動的地下成員。

一輩的華人，在政治上也多為左傾思想，即使沒有實際參與武裝鬥爭，也會默默在暗中幫助地下活動的人。致使在當時，整個農村的氛圍也以左傾為主，砂拉越人民聯合黨（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下，於 1959 年成立了。雖然也有部分華人支持右政派黨，如砂拉越華人公會（Sarawak Chinese Association），但是屬於相對少數的力量。

### （一）反殖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是砂拉越左翼運動最蓬勃發展的時候，當時農村華人青年紛紛受到左翼思想的影響，參與以「反殖民、反帝國」為主要訴求的獨立運動。

我們要給砂拉越人真正能代表砂拉越人的國家，因為我們當時就是認為那個本質還是殖民主義的政策…然後國家安全局的政策也是…但是後來我們國家〔砂拉越〕獨立了，為什麼還是繼續沿用這些法令，就讓我們很反感。（鍾爺爺 2013；重點是受訪者所強調的）

從小就是 17 哩人，在年輕時曾參與過左翼運動的鍾爺爺，在訪談中提到了他們當時的訴求。他們這些思想的萌芽除了受到世界各國在二次大戰結束後，殖民地解放浪潮的影響之外，當時引領農村的青少年接收到這樣新思維的其實來自於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其中又以到農村教書的教師居多。

1029 那個罷課運動<sup>6</sup>都是有關係的，那個整個砂拉越、古晉都形成這種新的潮流，進步青年、新的思想，中國解放我們這些人在思想上的影響，就變得很嚮往這些東西。你看那些搞學運的學生…很多是一中的學生，他們後來出來當老師，他都有一個任務，就是要來培養這些學生。1029 之後有很多學生已經吸收了這些共產思想了…他們有了這種思想以後，就在進行這種活動，宣揚、傳播。我們的老師也很多是一中出來參加的……那個 1029、330 罷課運動<sup>7</sup>的。受到那時候思想的學生，以後就把那些思想帶進農村的小學，在他們教書的時候。我們也是受到他們的影響，他們培養了一些幹部，也是學生。（溫爺爺 2013）

當 1950 年代的工會運動在砂拉越如火如荼的進行時，來自城市或中國移民至砂拉越的教師帶著新思維進入了郊區的農村，為農村帶來新的衝擊。他們在學校挑選在課業、社團活動表現較為良好的學生，於課餘時間組織學習小組，深讀左翼思想，並在之後組織青年會。

6 這裡所指涉之「1029 工會運動」為 1951 年 10 月 29 日，古晉中華中學爆發了砂拉越史上最大規模的罷課鬥爭。起因是砂拉越當時受到二次大戰後，反帝、反殖浪潮的影響，使學生透過學生會出版之刊物進一步的宣傳這些進步思想，卻遭到英國殖民政府的干涉和壓制，導致學生的群起反抗，並選在 10 月 29 日開始進行罷課行動（盧友愛 2012）。

7 「330 罷課運動」是繼 10 月 29 日的罷課鬥爭失敗後，在 1955 年 3 月 30 日於古晉的另一起罷課行動。起因為古晉中學生對當時學校教師的教學方式感到不滿，在對學校提出多次改善或更換教師之建議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同時學生代表還因此遭受校長開除，引發了隨後一系列的罷課行動。而這些學生運動所培養出的學生幹部也在之後帶起了砂拉越長達數十年的左翼運動（盧友愛 2012）。

他們是選比較好的學生。學習小組是砂拉越先進青年會的外圍組織，比較高一層的就是砂拉越先進青年會，然後我就是那小組。老師就開始一班一班物色，哪些人不錯……起先是看一些文藝活動啦！慢慢的他們就會拿一些書籍給你看……就是社會主義、如何革命之類的。（鍾爺爺 2013）

年逾古稀之年的兩位報導人鍾爺爺與溫爺爺，在當時都像 17 哩多數的青年一樣，在就讀華小的階段就受到老師的鼓舞，在學校參加了課餘的學習小組，隨後跟隨著浪潮參與組織活動，並加入了 1959 年剛創立的砂拉越人民聯合黨，正式成為黨員，投身更多反殖運動。而這種潮流，也繼續延續到 1963 年砂拉越被併入馬來西亞聯邦後。

## （二）反大馬

冷戰時期（1947-1991）世界陷入左右兩派陣營的角力戰，英國為了維持其殖民統治利益，於 1961 年提出「大馬來西亞計畫」，進行馬來亞、新加坡、砂拉越、汶萊及北婆羅洲的合併計畫。砂拉越之反殖民與追求獨立的理想，與鄰近印尼親左蘇卡諾政權互為表裡，<sup>8</sup> 也因此陷

8 1955 年萬隆會議在印尼召開後，中共企圖整合美蘇兩大陣營以外的「第三世界」力量，積極向國際輸出共產革命。當時的中共總理周恩來提出「和平共處五原則」為中共與亞非國家的建交工作奠定基礎。中共積極訓練並援助亞、非、拉丁美洲各國的共產黨勢力，擴大武裝鬥爭，隨著中共政情的發展，當然這股風潮也影響了砂拉越的華人社會。印尼的蘇卡諾總統在 1963 年起與馬來西亞進行了三年的「馬印對抗」。起因於 1963 年馬來西亞聯邦成立，結合了過去英國在東南亞殖民地，包含馬來半島、新加坡、婆羅洲北部的沙巴和砂拉越。但蘇卡諾認為英國這種做法不僅保存了廣泛經濟利益，也將新加坡作為其海軍基地之一，同時又罔顧婆羅洲北部人民普遍反對加入馬來西亞的輿論。再者，致使蘇卡諾如此強烈反對的背後原因在於印尼為本區域最大的國家，但英國在規劃這件事情時竟未向他諮詢。另一方面，蘇卡諾此後在政治態度上左傾，使得鄰近印尼的砂拉越在當時爆發的一系列左翼運動也和印尼有緊密的連結關係（Cribb and Brown 1997）。

人共產泥淖。1963年7月22日砂拉越短暫獨立77天後，於9月16日被併入馬來西亞聯邦，成了馬來西亞一個州屬。左翼運動並未因此減緩，反而因印尼蘇卡諾政府在背後的支持，讓左翼運動持續在地下進行著。

那時候是一個潮流，就會號召我們去參加。而且也沒辦法，沒有什麼選擇。你不去等下人家罵你。好像…你不參加就好像變成反派了嘛！所以說看個人的立場、個人的思想怎麼走，就跟著大隊囉！那時候很轟轟烈烈的，假如你不參加就會給人家講你是什麼走狗、漢奸什麼的。（李婆婆 2013；重點是受訪者所強調的）

李婆婆現年68歲，<sup>9</sup>從小就在17哩的農村出生，家裡除了製作與販賣豆腐外，還種有胡椒、蔬菜。在家中12個手足中，排行老大的她因為要幫忙家計，再加上父親重男輕女，讓她比同年齡的小孩都還晚去上學，而這卻使她後來更為珍惜這得來不易的讀書機會。小學時，她與先前所提鍾爺爺與溫爺爺一樣，都被選中參與學習小組。待小學畢業後，適逢反殖、反大馬運動蓬勃發展，花樣年華的她，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沒有太多的思索。即使起初她根本不清楚那些左翼分子到農村所宣傳的「反政府」代表什麼意思，但是當周遭的朋友一窩蜂地投入這些活動時，如果自己不去參加，就會遭致其他村裡的年輕人非議。那是一種建立以華人政權主體的理想，不接受這理想就是「漢奸」與「走狗」。

9 本文所談及受訪者之年紀，皆以田野時間之2013年為計算基準，以下同，不再贅述。



1963年當年18歲的李婆婆不顧母親的反對，跟隨「潮流」，傾心、傾力地投入左翼地下活動：

不會害怕！就沒有想到害怕，就一直衝喔！都跟著他們囉！好像很新奇的樣子…就是訓練小組這樣呀！幾個人一組這樣囉！或是一個 club，那時候我們參加有時候就是三天三夜的喔！就在山芭<sup>10</sup>裡做訓練…（李婆婆 2013）

就如農村中一個個驍勇善戰的青年一樣，在當時尚未結婚，還沒有太沉重家庭負擔的他們，村落中同儕的影響力，遠大於家中親人的反對。因此無論男女，多數年輕人一邊跟著組織在私底下受訓練，心中同時抱持著有朝一日砂拉越也能夠獨立的夢想，以至於在任何衝鋒陷陣中都無所畏懼。

我大概20多歲一點加入的……那時候年紀還比較輕，看東西好像都覺得沒有什麼…有一股那個熱血啦！很衝動……人家講什麼，我們就好…15哩那邊會比較白區<sup>11</sup>啦！這邊會比較紅區<sup>12</sup>…我是因為那時候我喜歡看書、看報紙……然後我就參加了學習小組…還有參加歌詠隊這些…。（黃爺爺 2013）

10 山芭為馬來西亞當地用語，用來指稱農地或尚未開墾的荒地。

11 白區在這裡指的是左翼運動相對不盛行之地區。

12 紅區相對於白區，意指左翼運動發展較旺，有較多人參與之地區。

年紀比李婆婆稍長，現年 80 歲的黃爺爺，他出生於在親政府色彩較濃的 15 哩。當時在家中經營雜貨店的他，是家中的長子，即使在左翼運動支持力量較小的區域，他還是堅持立場，甚至常與立場相異的父親產生衝突。

家裡控制我不了……父母……尤其是我父親……因為那時候我跟他可以說是鬥的很兇啊！很厲害啊！不過我對這些東西啊！如果我信啊！我要啊！我就不管你了。我認為我並沒有錯啊！後來我就去了。老實講，我父親對我後來也妥協了。（黃爺爺 2013）

當時在農村中像黃爺爺這樣在年輕氣盛時，與家人在政治意見上產生衝突的年輕人有許多，他們在之後紛紛走上了左翼運動這條路。只是在這條路上，有人在受過訓練之後，選擇遠離家鄉躲進馬印邊界<sup>13</sup>的森林成為游擊隊員，待之後再伺機而動；有人則是選擇加入政黨，一邊參加公開的政治活動，私底下仍然繼續幫忙游擊隊隊員，提供必要的援助。有些人可能在與政府的駁火中犧牲，再也回不了家。這是許多家庭的悲歌，如同報導人溫爺爺的姐姐，就是在某一場攻擊行動中去世。除了這類悲歌外，還有許多人是在參與行動的過程中，即使保全了性命，卻被抓去監獄，一關就是近十年的歲月。

---

13 砂拉越郊區因鄰近印尼，在當時左翼運動後轉為游擊隊的成員，於後來多躲到邊界的森林進行活動，以躲避政府的追捕。

### （三）改變命運的那晚

那幾道槍聲引起強烈的震撼，住在周邊地區的草民馬上成了殃及的池魚，我們才住了一年的屋子就要被迫放棄了。（夢羔子 2011）

1965年6月27日晚間10時，部分左翼地下組織成員與早已埋伏於古晉的印尼兵，決定對17哩鄰近地區最高點的18哩警察署<sup>14</sup>發動攻擊，正是這陣陣槍聲，改變了華人居民的生活：

那時候我就跑到第二路要到店那邊的時候，我就看到有火在那邊，看覺得不對勁，我就不敢去了，傳單就丟在那邊沒有發完，就馬上拉著我弟弟回家，回到我家不一下，警察署就響了。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他要打警察署。（李婆婆 2013）

在事件發生的當晚，住在17哩鄉村，原本就一直有在參與左翼運動的李婆婆正巧拉著弟弟在17哩偷偷摸摸的於各家發放地下活動的傳單，卻剛好遇上巡邏的官兵，所以只好先行返家。他們回家後不久，準備梳洗上床休息時，卻聽到遙遠的地方傳來陣陣槍聲。

而另一位當時住在鄰近事件發生的警察署約半公里遠的彭先生，回想起那個讓他印象深刻的一晚時提到：

---

14 這間警察署實際的地理位置是在17哩與18哩之間的村落範圍內，當地人一般都稱這個警察署為18哩的警察署。

我記得很清楚…那時候地下分子攻擊那個警察署的時候呀！整個天空都是那個火花，好像華人新年打那個煙花一樣，乒乒乓乓……整個天空都是火花…他們用槍攻擊，去炸那個警察局。在我店屋二樓開個小窗門，那時候還小……還覺得很好看。那時候英國士兵還不錯，跟我說「小弟弟你不可以在這邊看，你要跑到底樓，不然那個槍彈會打到你。」……我們在自己的家看，遠遠的看。可是到了第二天，全部的軍隊、警察、直升機啦！都到了 17 哩的籃球場那邊集合，去尋找這些地下組織。（彭先生 2013）

當時年約 14 歲的彭先生，由於家中經營的雜貨店正好在 17 哩鄰近成邦江路的路旁，又正好離被攻擊的警察署不遠。所以當事件發生時，從家中窗戶探頭便看到遠處警察署上方傳來陣陣火光。不過在當下，他們整家人與附近鄰居，都不知道警察署那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直到隔天一早，彭先生家門前的籃球場，突然集中了大批的軍隊與警察，開始要進一步的調查附近可疑的左翼人士。

即使 17 哩附近的華人區域有多數人是左翼背景，在事件發生的當下，若非主要的核心幹部或參與策劃此行動之人員，其實根本一無所知。大部分的人都是隔天私底下道聽塗說後，再慢慢透過政府於報紙、廣播的宣傳，才終於知道原來前一晚的攻擊警察署的行動，是砂拉越部分的左翼人士與印尼兵所為。

但是，在這個原本就有許多左翼人士居住的區域，相對於古晉市區的人民或其他沒有參與任何左翼運動的人，他們對於政府在攻擊行動

後，於公開報紙上抨擊與醜化此次的攻擊行動，仍然是不以為然的。如曾參與那晚攻擊行動的村民鄧爺爺回想起那晚的行動時提到：

〔當時攻擊行動是〕上面通知的…印尼是很早策畫要打的。他們意思是要去打飛機場…後來發現打了難逃，也沒有用。〔才會想說要打 18 哩警察署〕，可能是打了要逃也比較快。所以那些人直接一開始就住在 16 哩那邊的園…就從 16 哩過來打，然後打完就直直上，上到 24 哩那邊的橋。那時候策畫的很好，不會失敗！最後也沒有人被抓到……當時是為了要顯示革命理想，轟動國際…那時候〔原本〕有去阻礙他們，叫他們不要打。但武器那時候已經全部運過來了…那個武器是很早就安排了，一直移到 16 哩，那些人就暫時都在那邊。所以後來就安排 18 哩警察署來打囉！…一開始當然不知道囉！幾個頭知道而已…那時候就從運動場那邊打過去…以前那裡是一座小山，就這樣砲對準警察署，後來就跑了，跑去 21 哩。（甲必丹鄧爺爺 2014）

對比於政府在報紙上，提及這些左翼人士總以「恐怖份子、敵人」稱之。訪談時，鄧爺爺卻是意氣風發地講起當晚的攻擊行動。他提及當時雖然砂拉越當地的左翼人士想要暫緩此次的行動，卻涉及到埋伏已久的印尼兵對於攻擊行動的壓力，最終使得砲火在當晚一觸即發。

由於事件有印尼兵的介入，使事件擴大為國際政治問題；同時，在那個展示革命理想且自以為能夠成功的夜晚，這群左翼人士其實並不知

道在這次攻擊行動中，被射殺的警官正是砂拉越州首席部長加隆寧甘的親弟弟，於是後續處理方式交雜著首席部長痛失胞弟的私人情感因素。原本欲藉此次行動彰顯勢力的左翼人士們，在這次事件之後一系列的餘波盪漾中，受到很大的打擊。同時，也讓 17 哩鄰近區域無論是左翼背景或是毫無相關的華人們，都在往後的生活遭受波及。

#### （四）鐵鎚行動

6 月 27 日之後的幾天，政府雖然派出了軍隊、警察嚴格看守 17 哩附近區域，7 月 6 日便下令執行「鐵鎚行動」。鐵鎚行動意指「要用鐵鎚捶打共產份子，在共產黨人與革命份子棺材上錘下鐵釘」（盧友愛 2012：91）。因此，一系列對於防範與攻擊左翼人士的政策也隨之出現。包含：1. 成立管制區移植計畫，對當地實施戒嚴，且著手進一步進行新村成立計畫；2. 在管制區內的信箱行動；3. 砂拉越各地的管制行動；4. 報館與任何傳播媒體，被下令須與政府合作，不能報導有助於左翼人士之內容。

如依據在 1965 年 7 月 8 日，在鐵鎚行動宣佈兩日後的砂拉越本地《詩華日報》當時的報導，即可略知那段時期的狀況：

首長召見兩反對黨領袖 闡釋政府所採行動 首長謂管制地區  
乃共產黨溫床 共產黨及親共居民佔八十巴仙<sup>15</sup> 並警告報章勿  
發表不效忠言論

首席部長也於昨日九時在其辦公室舉行記者招待會，首席部

15 巴仙為馬來西亞華語對 percent 的翻譯，意為：百分之。

長會上透露，政府較早時宣稱要在邊境地區實施移置計畫，其實該邊境地區就是指目前這個地帶，政府所以未指明上述地區，是唯恐預先宣佈時，十五哩、十七哩、十九哩、廿一哩及廿四哩一帶的華人，可能通通都跑掉。

首席部長又稱，該區是共產黨的溫床，那兒的居民效忠政府者只有廿巴仙，另外八十巴仙不都是親共產黨，即是共產黨人。因此，政府必須要在這個地區內實施移植計畫，以作為對該區華族居民不與政府合作的一個教訓。

首席部長同時亦呼請報館與當局合作，並警告稱，如報館採取不合作的態度，發表違反本邦，有助於敵人的言論，當局將採取嚴厲的行動對付，主編將遭拘留，報館也將被封禁。（作者不詳 1965a）

在鐵鎚行動宣布之後，政府除了一方面打擊左翼人士的勢力之外，在新村成立之前的管制區移植計畫，也讓 17 哩附近的華人，在生活與人身自由上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成邦江路管制區農人渴望運出農產品出售 商人要求至晉配貨未獲准 居民營養不良因濕氣患病  
自當局宣布晉連路十五哩至廿五哩為管制區以來，警方逮捕了約五十名嫌疑共產份子，在他們中包括縣議員、校董、教員、農人等。

據稱：他們先後被押底本市對河集中營去<sup>16</sup>。

又悉：他們的受逮捕，可能是警方依過去的黑名單而採取這項行動者。

記者周日訪問該地區時獲悉，他那兒的人民已有上千名患上了病。根據醫務人員稱。他們所患的病大多數是因水份不足營養不良以及濕氣等關係。

據該地區商店老闆稱，他們的存貨無多，曾要求當局應許他們前來本市配貨。但還沒有獲得批准。他們希望當局能迅速的解決此問題。

菜農與椒農稱，他們正渴望當局為他們的蔬菜、胡椒、樹膠等物品，運出管制區外拋售。因上述農產品如蔬菜成熟了，沒有割下，會腐爛的。胡椒與樹膠沒有售出，便沒有辦法買到米糧。

新村居民稱，衣食住行是他們的四大問題了。

警方一發言人昨午宣稱，晉連公路十哩路至廿四哩白天上午六時至下午七時通車的限制現已取消，但在必要時，將不予通告而在沿路設路障及檢查站檢查來往的交通。

茲促公眾注意，該區仍在每天下午七時至翌晨六時實施宵禁，除非持有省督監的准字。任何非土著人士只能居住在十五里、廿一里及廿四里等集中居住區不准居住在管制區其他地方。

平常不居住在管制區的人，夜間不要留在集中居住區

16 一開始因左翼運動被捕的左翼人士，會先押到古晉另一個監獄，隨後才會被轉送到六哩的拘留中心。



內，因為可能受到很大的不便。

在實行鐵鏈行動期間，被令限居的人士，除非持有省警監的准字，不得在任何時間離開管制區，同時在下午七時至次晨六時間，不得離開他們受限的居住地。」（作者不詳 1965b）

據 1965 年 7 月 14 日詩華日報報載，管制當時，17 哩鄰近的所有華人區域，從成邦江路 15 哩至 24 哩，各區域的華人，都被各自集中於不同的劃定管制區。在管制區內的華人，若非有特別的出入通行證，否則都無法離開管制區，只能在每日晚間七時至隔日凌晨六時以外的時間，回到居住地範圍內的田園務農。

然而，對於這些管制區的華人來說，即使可以在指定的時間內回到園裡工作，也需要面臨這段時期收成的蔬菜、胡椒或橡膠無法運送到城市的窘境。再加上他們被強行遷入管制區時，大多數人都處在慌亂、不知所措的狀態之下，以至於他們不僅在經濟上面臨很大的壓力，在精神或自由被限制的疲勞與衝擊亦是。

如當年才 10 多歲，卻仍對當時的情景記憶猶新的陳先生描述起那天的晚上：

1965 年的那個晚上有那個車子要到西連去，然後他們就去炸掉那個橋，不要讓人過。然後那些「山老鼠」又去攻打警察署。之後早上的時候，飛機就在天空飛一邊發傳單，過不久就變成禁區了，我們 15 哩那裡也同樣變成禁區了。（陳先生

2013)

陳先生家住距離 17 哩約兩三公里遠處的 15 哩，雖然事情發生的地點與他們所在的地區尚存一些距離，但由於他們居住的 15 哩農村多為華人聚落，因此也遭致牽連管制：

那時候還是禁區不能出來。把我們禁在店那裡三天，不能出去。到了三四日之後，才可以回去家裡。但是回去還是要求拿完東西就要回來我們家的店那裡。然後如果要去巴剎必須要拿卡，才能出去。（陳先生 2013）

另一位同樣住在 15 哩地區的官阿姨，在事情發生時，已經 10 多歲，因此她之於上述提到的陳先生，感受又更深刻了：

以前我們家是在幫人割樹膠的。那時候發生事情的時候，我們也剛好在割膠，在等那個膠流出來的時候，剛好飛機跑過……那時候我才 10 多歲而已。那個飛機還丟那個傳單……我現在都還記得有紅色、有青色，我們就想天上的飛機有可能會講話嘛！我們就很怕……因為也不曉得是什麼東西。因為它丟太多了……我們就拿那個傳單，就那紙來看。它上面就寫叫我們看到這個通知就要回家了……我大哥、大嫂……我們就回家囉！他叫我們回家，那個樹膠就沒有收了，全部收收就回家去了，身體都發抖，很怕……（官阿姨 2013）

當時家中以幫人收割樹膠和種胡椒為主的官阿姨原本家住 15 哩，由於他們家不像這個區域內多數的華人家庭，多多少少都有親戚或朋友去參與左翼地下活動，以至於他們對於左翼運動的狀況一無所知：

起初的時候，是有一點亂啦！講恐怖份子、共產黨…前幾天那飛機還沒來來的時候，就有聽到很多消息了，講警方有開槍打死，他是講恐怖份子…那時候是有聽到這樣的消息啦！〔但〕還沒有通知，就還沒有叫我們去禁區的時候，就有聽到這些消息了。〔對於左翼人士〕我們不知道、我們根本就不可以知道…一開始就很平靜啊！後來他們共產黨的就是反政府的嘛！我們那時候就回家，那時候滿屋子的兵。很多政府的兵！他叫我媽媽講說趕快收拾一些衣服、什麼啊！不可以住我們自己的家了。要搬去店那裡…通通人都要搬去店，不是只有我們搬。只要是我們那個鄉村的人通通都要搬去店…因為他就投那個傳單了…叫我們回家嘛！回到家就很多兵在我們家，大概有 20 多個兵…（官阿姨 2013）

但是，真正讓官阿姨他們感受到恐懼，在於當時政府在發生鐵槌行動後實行的高壓手段，迫使這些華人在毫無準備之下，像逃難一般離開他們原本在膠園裡的家：

你看這樣突然間叫我們搬走，離開我們的家…哪裡捨得…哪裡不哭啊！我媽哭喔！我們也哭……就收拾那些重要的東西

走囉！我們出就去我們比較認識的那裡……他沒有限制說我們要去看哪一間店，沒有！是我們自己去找的…那個店老闆也不能夠講什麼…就是誰來了就收…〔當時〕從園裡回家。就樹膠什麼就先挑回家…〔兵〕幾時來我們也不知道，因為我們也沒有在家。這樣突然間叫我們這樣出，誰不嚇壞了…而且後來去店的時候，拉子<sup>17</sup>和馬來人就沒有…就是這樣很不公平嘛！這樣原本我們園有種什麼東西…我們就不能夠看守了。土人有幾種，有馬來人、土著他們…他們就自由跑，就只有我們華人給他這樣關，算起來也是很 unfair 啊！（官阿姨 2013）

官阿姨或陳先生當年年紀尚小，並未參與左翼運動，但講起這起攻擊行動，以及後續政府的作為時，那個突然被迫搬遷的陰影，也一直存留於心中，讓他們不僅心有餘悸，甚至多年後再次提起那段往事時，對於原本在 15 哩的家還是憂傷和不捨。

在這些記憶的背後，對於沒有涉及的華人來說，除了面對左翼人士隨時可能出現的恐懼外，還必須面臨當時華人聚落內左右兩派相異立場的對立，甚至是被迫選邊站的無奈。就如同回溯到最初左翼運動進入到這個古晉郊區的華人區域時，報導人李婆婆即提到「不跟著大隊走，人家會說你是走狗。」因而在整個大潮流之下，多數人選擇追隨，即使對於這個「反政府」的大隊，有著許多的未知和不明瞭。而這種氣氛，也繼續延續到鐵槌行動後的管制區與新村階段。這使得原本如果就是相異

---

17 拉子為當地華人對原住民略帶有歧視性質的稱呼

或無特定立場的華人，在進入了管制區生活後，生活反而更為困難。再加上政府之後於鐵槌行動下的一連串管制，讓這些無辜，也不願被波及的「受害者」，在回憶起當年這段往事時，是充滿憤怒與無奈的。

然而，無論是哪一方立場的華人，在面對龐大公權力制約下，終究都無從抵抗。再者，政府下一步的新村成立計劃，美其名是新生活的再造，但對這些華人來說，也許又是另一個未知的恐懼。

### （五）去六哩念大學

17哩警察署攻擊事件只是浮出檯面的武力抗爭，在此事件的前後，則是遊擊隊的軍事訓練，而訓練基地即位於印尼，客籍青年越過邊界，前往受訓。

62年的12月28日汶萊起義呀！63年，地下頭[左翼人士的領導]決定要武裝鬥爭，在六月的時候…我被抓的時候是6月7號。那時候要過印尼，就在邊界那裡被抓的…但是當時我們就是受到這種影響，受到中國那種參加革命的影響，那就是能夠拋開你個人的一切。之後就到被捕後，就到六哩讀大學囉！（溫爺爺 2013）

在 1962 年汶萊起義<sup>18</sup>後，於 1963 年的六月，在 17 哩長大的報導人溫爺爺也和這個區域中許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前往印尼，準備接受進一步的游擊隊訓練。但卻在途中遭到政府軍隊的攻擊，不僅無功而返，數百人還因此遭受牢獄之災，在之後於六哩監獄待了近十年的時間。六哩監獄位於古晉國際機場附近，通常叫做六哩半<sup>19</sup>，被政治犯們戲稱為「大學」，而且還將監獄的生活稱為「吃咖哩飯」。

而另一位蘇爺爺，雖然沒有參與地下活動，但也在之後跟溫爺爺他們一行人遭逢同樣的命運：

不知道是怎麼牽連到的，不過當然是有原因的。以前我在西連的時候，他們要越過邊境，要搞那些活動，我有幫忙他們，可能是因為這樣吧！我事實上也沒做什麼，就是幫他們安排交通這樣。但你協助他們地下的太多了嘛！他們要[人聯黨]黨徽我就拿黨徽<sup>20</sup>給他們…就那天只有我們三個人啊！我們一起被逮捕，後來在監獄遇到。在中央監獄那…是後來才去六哩的。就在裡面七年啊！（蘇爺爺 2013）

18 1962 年 12 月 8 日的汶萊起義，是由汶萊人民黨所發動的武裝起義政變。起因於 1956 年汶萊人民黨欲爭取汶萊獨立，1957 年派代表至英國進行談判，要求制定憲法，讓汶萊獨立，卻遭到英國殖民政府的拒絕。直到 1962 年汶萊舉行選舉，人民黨在立法議席囊獲勝利，使得汶萊政權掌握在人民黨手中。但當時英國著手進行的「馬來西亞計畫」正積極進行，隨之遭到人民黨反對。人民黨便在此時欲聯合同樣反對馬來西亞計畫的砂拉越人聯黨組團前往聯合國總部申訴和反對馬來西亞計畫，且要求結束殖民統治。不過，卻在此時，人民黨在汶萊發動武裝政變，致使英國出兵鎮壓，讓汶萊的獨立運動受到挫敗。但並沒有因此士氣大敗，反而連帶的影響砂拉越左翼運動更為蓬勃的發展（田英成 2012）。

19 六哩半為古晉政治拘留中心確切之位置，位於古晉的六哩至七哩之間，但當地人在口說時一般都稱這個居留中心為「六哩」，因此本節標題與文內敘述，皆以「六哩」做為代稱。

20 報導人蘇爺爺在訪談時提到當時人聯黨跟印尼的關係較好，所以有許多左翼人士在馬印邊界藏匿時，若身上配有人聯黨的黨徽較能受到印尼的照顧。

頭髮花白、年過八十，講起話卻鏗鏘有力的蘇爺爺，原本並非是 17 哩的人，而是住在距離 17 哩約半小時車程的西連。當時家裡在西連開店的蘇爺爺，一直以來都只熱衷公開政黨的活動，私底下的左翼活動並沒有特別接觸。但是當地下分子有難時，他仍毫不猶豫的盡心幫忙，導致後來被捕入獄。

除了溫爺爺和蘇爺爺之外，前文提及的黃爺爺，被捕的狀況與時間點，略有差異。黃爺爺從參與左翼活動以來就比較專注於地下活動，在 1963 年時也曾跟著組織去過馬印邊界，在訪談時他便從他去印尼受訓的過程談起：

我去印尼一次…去不到邊界，就被那個人就保安部隊的…那時候好像被抓去 69 個人…那次就我比較幸運，在中午那個兵來抓我們的時候，我們住的那個小屋子，我們分成三個小組，我跟另外一個同志剛好跑去沖涼。那個兵是從那邊來，我們沖涼是在這邊，剛好我們去沖涼還沒沖好。然後我的同志就說，「某某人好像有兵喔！」我就說：是嗎？我還不大相信喔！怎麼會有兵。後來跑上看，好像是喔！兵包圍起他們…後來我的同志就問我說「要怎麼辦呢？」我們沒有怎麼辦，只好倒回 [ 回去 ] 囉！那時候還有其他沒有被抓到的…我們那時候跑出來大概有 10 多個人，去了是總共大約有 80 多個。（黃爺爺 2013）

他雖然在 1963 年跟著組織一起去印尼受訓時幸運地未受逮捕，但

當 1965 年新村成立的初期，這些在新村內的左翼分子其實並不隨著新村變為管制區而停止活動。相反地，在新村裡私底下的他們還是技巧性的繼續組織與策劃，甚至擔當起躲進森林裡的游擊隊隊員們的後勤部隊，提供物資上的補給與情報上的交換。

69 年我第二次要出的時候，又要去參軍了。那時候去海口區…那時候很多從邊界回來，本地的人就跑到海口區，又再參軍喔！那時候還不知道這麼亂、還不知道我們的勢力已經輸掉這麼多了，我還不清楚。那些領導的叫我們去，就去囉！我們在新村裡就是秘密囉！所謂地下就是這樣囉！有時候就跑一個比較秘密的地方囉！…只要我們自己了解，你要做什麼東西，都計畫好好先。像去別人家也有，還有像我們就經常跑到我們的園芭〔田園〕！我們有些比較小的集會、活動啊！可以新村裡面也可以嘛！就好像是朋友來家裡拜訪這樣。我們好像有什麼活動、集會啊！都會有人站崗。人的活動也是很靈活的。他如果需要的話，他就會很注意啦！然後 1969 年，那時候那個計畫就是想說會真正離開這個家了！

（黃爺爺 2013）

當時已經住在 17 哩搭建的新居的他們，雖然面對生活的管制以及新村成立後農作物的損失，但仍在困頓中續持維繫組織的運作。1969 年黃爺爺又和 17 哩的朋友們選擇再度離家，去古晉郊區的海邊參與進一步的行動，正是這波行動，他們遭到逮捕。



我就是要去海外〔古晉郊區的海邊〕，被人家出賣了，我就去到半路，我還沒有去到海外喔！我一共是五個人嘛！兩個人跟我一起找人…那時候就覺得有點怪怪的。傍晚六點要跟他一起去…找不到人。沒有人，我就跟我一起跑的人講，這要小心啊！好像情形不太對！話還沒講完，那些人就出來了。在村子是規定六點要回去，我沒有回去，所以〔我〕有通知家裡的人，跟我太太講，我沒有要回了，叫她六點以後去警察署呈報。說某某人沒回…這樣家裡的人就不會錯了。因為他〔警察〕會查哪一家沒有回的…就我們沒有回來的話，家人就要去報警察署。但是後來…就被抓囉！那兵已經埋伏在那邊了。幸好是我們剛好沒帶槍，如果有槍就給他射了！之後被人抓到那個暗房，地下室…伸手不見五指的！那一次好像一共…將近 30 人被抓，就是要參軍的那些。也是可以講不幸中的大幸，假設如果我們真的去參軍了，命還有沒有在都不知道了。我們被抓，那個命至少還保在那邊。就是家裡的人比較苦一點啦！（黃爺爺 2013）

黃爺爺他們在這場行動中倖存，但是他們的家人卻必須比他們更堅強，家人的煎熬絕對不比那些左翼人士來得輕鬆。他們的家人除了要擔憂親人的安危，還須面對政治與經濟上的壓力。例如，當警察來家中盤問在管制時間內還沒回家的親人時，他們無法閃避，只能隨時在擔心害怕中面對。同時，遷入新村後，受限於管制時間的限制與胡椒蟲害的影響，家中的經濟更是雪上加霜。而這種日子，又一直持續到這些村民被

關進六哩拘留中心之後。

監獄裡的政治犯對外的行動受到限制，但生活上還是不受完全制約的，在必要時也會聯合起來絕食抗議，抵抗政府。如報導人黃爺爺所提及當時他在六哩的情形：

後來那些黨員比較活躍的，幾乎都給他抓去了，抓到六哩去啊！那時候六哩，有段時間最多人給他抓進去了，不會少於兩千五。一天可以吃掉 100 公斤的米！那時候六哩的生活基本上是還可以住啦！我們裡面的生活，也是有地下組織喔！我們在裡面還活動喔！抓進去了，還是要堅持啊！我不跟你合作嘛！好像為了一件事情，我們裡面就鬥爭…就絕食…但平常的時候，我們在裡面也會自己去學東西囉！有學馬來文、文化啊！就大家互相教。（黃爺爺 2013）

而 1963 年因為在砂印邊界被捕直到 1972 年才被釋放的報導人溫爺爺，也進一步補充了在六哩的生活：

在裡面〔六哩〕主要有學習馬來文。我們在這邊學了小學的課程…我們主要學馬來文，還有學英文。就是有一些比較會的人來教…因為那個拼音很容易，我們知道那個拼音後，我們學會了就能夠念那個字。那時候就想說，我們要懂得多一種文字…這對我們來講，我們就可以跟他們交流了。然後我們還有學習小組，以前有一兩個跑進去，他在外面是領導級

的，他就會弄一些東西給我們學囉！（溫爺爺 2013）

不過，即使在裡面他們多數時間可以自由學習語言，或是暗自組織學習小組學習新的東西，但是在閱報上，還是會受到政府的控制。同時，政府無論是對六哩的他們毫不間斷地宣傳反共思想，對六哩外公開的廣播、報章新聞上亦是。

政府的宣傳還是有…就是報章上或廣播電臺…但其實我們還是走自己的路，不會去相信那些…政府你宣傳你的囉！〔報紙上寫的〕比較多是都不會相信，都是用懷疑的眼光去看這樣…在裡面的報紙，有些新聞也會被塗掉，像跟革命有關的，他就塗掉。（黃爺爺 2013）

但在六哩的日子，終究比不上與家人的團聚。慢慢地，有許多被捕的左翼人士也開始考量到家人在外面守候的辛苦，再加上政府反覆在拘留中心的宣傳與鼓吹，讓每日的精神壓力達到緊繃，致使許多人在百般不願下簽了自白書，在承認與說明自己曾經做過的事情後，才得以被釋放。如黃爺爺與溫爺爺皆是：

還可以！老實講就是家裡面的人比較苦啦！那邊自己生活可以…也不用做工。但那時候講就是為了革命囉！只好堅持…那時候也是有想要出來…但就被關在裡面不能夠出啊！那時候每個星期，家裡的人就去看我們一次囉！那時候就跟他講

講一下，安慰安慰囉！六年的時間就這樣過去…（黃爺爺 2013）

我在六哩被關，從 63 年到 72 年尾才出，九年多…之後我就出來回來過正月半囉！後來是要出來也可以，就是要去坦白以前你做的事情，然後看你有没有誠意囉。（溫爺爺 2013）

不過真正影響他們兩位或是其他多數在六哩的左翼人士，最終願意寫自白書的原因在於 1973 年斯里阿曼和平協議的簽訂。這個協議的簽訂，除了致使砂拉越整體的左翼運動日趨減緩之外，也讓這些在六哩的左翼人士在夢想破滅、失望之餘，開始重新思考人生的下一步，並省思自己過去所做的這些事。人終究還是得回到日常生活中正常生活，再者當時新村成為管制區後經濟的壓力才是最必須要去面對的。

## 四、1974·圍籬裡的辛酸

### （一）新村誕生

新村管制區係仿效自 1940 年代英國殖民政府於馬來半島實施的制度，政府選定了 17 哩、21 哩與 22 哩，成立了新村，前二者是既有村落，後者則是新闢；同時將 15 哩、19 哩、24 哩等聚落封閉，居民則遷居分配到三個新村。從 1965 年 8 月 8 日砂拉越詩華日報的報導可得知，當鐵鎚行動宣布後一個月，政府即立刻選定了下一階段做為長久居留的管

制區：

農業與森林部長張桂生昨指出 西成路十五哩十九哩及廿四哩巴剎將予封閉——政府已選定地點建立新保護村

農業和森林部長張桂生先生今日披露說：當局已經在古晉西連路十七英里、廿一英里以及廿二英里半的地方建立三個新的保護村，這三個新村使用本地的名字來命名，就是實不蘭，布拉卓和達巴，張桂生說，政府選定這三個地點，因為這些地方適合建設永久性的鄉村，一方面因為這些地方為移植農民提供最便利之生活設施，這三個新村，是依照馬來亞各地土地和發展計畫之形式而設計的，目的是適合純粹農業生活之需求。張桂生先生說，每一個移植的人家可以得到三須古土地 [ 約 18X20 平方尺的大小 ]，這些土地稍後便將賣給每一家人<sup>21</sup>，年限為六十年，他說，土地測量員和估稅員已經在每一個新村展開工作，把土地農作物及建築物之詳細情形記錄下來，在徵用土地手續完畢之後，將作為償費之根據，凡是被徵用之土地都要遵照例常辦法，付還賠償費。

農林部長說：實不蘭（Siburan）巴剎將加以保留，巴剎商店之住戶將不回原來之場所居住，十五英里十九英里和廿四英里的巴剎將加以封閉，政府將建築新的商店撥給十五，十九和廿四里巴剎店屋之租戶和屋主去居住，不過並

21 這裡所提及之新村土地將賣給村民之內容，指的是每塊新村被劃歸土地的地契。但新村多數的村民並未在可以購買土地所有權時就購買，大都還是等到新村環境穩定之後才買下。

不是免費的，政府準備進行部屬把這些商店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賣出去。」（作者不詳 1965c）

而這三個聚落也在還在規劃期間，就被賦予了三個全新且富有意涵的名稱：

西成路三個新保護村 命名新生來拓及大富 — 意味擺脫共黨之威脅步向繁榮

星期日（八日），當局曾向古晉，西連公路管制區五個村莊居民，廣播了一項本州農林部長張桂生氏於七日在本州馬來西亞廣播電臺廣播的演詞的客話翻譯，並解釋了五個受保護新村的村落<sup>22</sup>。

本州政府發言人昨日稱，十七里新村的村名，塞布倫（Siburan），乃取之該地區的一座小山的名字。

業已告當地村民周知，這新村的官方華文譯名為新生村，意指當地人民將能過著新的生活，不受共產份子威嚇。

二十一里比拉卓（Beratok）新村的字，亦取之于當地的一座小山，官方譯名為來拓村，意指大家前來開拓，共同來開發這座村莊。

廿二里半的泰芭村（Tayah），是第三座保護新村，取名于當地流過的一條河。官方的華文譯名為大富村，意指大富大

22 意指在新村尚未成立以前的過渡時期，政府主要依據 15 哩、17 哩、19 哩、21 哩、24 哩分別在華人聚落的商店區規劃成的五個管制區。

貴與欣欣向榮。但希望將來不單大富村的村民，而是管制區的各族所有人民，皆能在一旦擺脫共產威脅之時，享有富貴繁榮。（作者不詳 1965d）

從「新生村」、「來拓村」、「大富村」三個華文新名稱可得知，政府期待這些華人能脫離左派思想與一切和左翼有關的行動，重新開始在新村展開新的生活，進而享有往後的富足。但這些「期待」，在當時新村裡根本不確定未來究竟在何方的華人來說，只是政府一廂情願的想法。因為真正面對不堪環境與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依然還是村落中的這些華人，再加上他們遷入新村生活的初期，並沒有如政府所期待地如此美好。除了必須面對無力抵抗的政治問題外，經濟的困窘、不安定，才更是這些新村村民所期待政府優先去解決的。

## （二）搬遷初期

鐵鏈行動後，政府開始選定區域，著手規劃與進行一系列的拓殖活動。以 17 哩為例，商店區之外的區域，依然還是為被當地華人稱為「山芭地」，是散居農民種植胡椒與蔬菜的地方。政府將三個新村之中最大的「新生村」選定於此，原本 17 哩佔絕大面積的山芭地，被迫徵收，全部剷平後，再重新劃分為村民新的居住地。政府以平均每戶面積約 25 點（18X20 平方呎）丈量劃定與抽籤決定村民新的居住地後，村民又再獲得 1,500 令吉的賠償金，做為村民在新的居住地建造新房屋之補償。不久，新村裡一間間長相雷同、大小也相似的鋅板屋開始佇立於村子的各個巷子，原本住在臨時管制區的村民，也於同年的 11 月初陸續搬進

新建好的鋅板屋。當時報紙所述：

管制區內居民昨日搬入新屋 首長文告呼籲合作防共

本州首長拿督寧甘特別向昨日開始搬入他們新生村及來拓村新屋人民發表下述文告：

六月廿七日，在本地共產份子協助下，印尼恐怖份子在你們的地區進行了謀殺。政府不能容忍這種殺害人民的行徑。因此，政府不得不採取步驟對付共產份子，並安排保護人民。對過去五個月內，社會上無辜人民遭遇到任何不便，政府表示遺憾，但你們必須明白這應該歸咎印尼人民及共產份子及那些社會上支持敵人或不揭露敵人的份子。

現在你們已搬遷新生村及來拓村，首先我欲向所有顯示合作建築起他們屋子的公民致賀，政府在籌畫這些新生村上，花了不少精力，所有人民亦如此。

這是良好理想，表示了人民正在學習跟政府合作。

新村的生活，在開始時不會太舒適，政府亦不擬給你們超過砂羅越所有其他公民的援助。可是如果你們勤勞工作，與當局合作，當可改善新村，使之成為愉快方便居住地。

這是很重要的，你們必須在驅逐共產份子方面，跟政府合作，政府將盡最大能力保護你們，但除非你們在得到有關共產份子及其活動的情報時，隨時報告。否則政府不能保證對你們的保護。在這方面協助政府是擊敗共產份子及確保社會安寧的最佳途徑。因此，為了你們自身的利益，隨時提供這種情



報。（作者不詳 1965e）

從報紙新聞的內容中可感受得到，政府表面上期許三個新村華人展開嶄新的生活，但實際上卻強調「擊敗與杜絕共產分子」，以至於忽略了其實在這種情況下多數的華人村民們，所擔憂的是在新村生活的民生、經濟狀況，至於「共產黨的侵擾」只是官方說法罷了。17哩新村的作家夢羔子，表露了當時的狀況：

新村一成立，政府就撥款一千五百令吉給每戶受影響的家庭，去興建同一個模式的鋅板屋。之前辛辛苦苦鑽進山林尋找木料，掏腰包去買幾千匹編織好的亞答葉，精力、時間與金錢都白白消耗掉了。起初，人們還能自我安慰，樂觀地預測，或許只是禁錮一段短時期，可是局勢越來越惡化，想回故居的願望也越來越渺茫。生活起居受到牽連，顧得了飯碗，已沒有多餘的精力修復那已無望再住下去的房子。（夢羔子 2011）

就如同大部分的村民一樣，起初剛搬進新村時，大家都還會在心裡想著，也許有一天還是能回到各自在遷移以前的家繼續生活，而非全家一家大小，通通擠在新村裡才約 18X20 平方呎大小的鋅版木屋裡。但在當時風聲鶴唳的情況之下，「回家」談何容易？

那時候我們在這，也不知道要在這裡住多久，是臨時的，還

是怎樣，就都是未知數…那個時候的心情很難…不像現在就是住定了…那個時候就都什麼都不知道…人家講說要關個三五年就可以回去啦！就…很那時候也不知道…可是還是想說有一點生活可以回到園裡生活。（鍾先生 2013）

再者，對這些新村村民來說，政府提供的補償並不足以支付建屋開銷；同時因為被迫搬遷，也讓他們對新村新建的房子和居住地更加缺乏認同感。總會暗自盼望著，搬回自己的老家，因此也談不上要購買在新村居住的這塊土地的地契了。

對，就是那時候，突然多了這麼多人…有點點不太適應這樣…不僅我啦！我父親以前也是很抗拒的，他說「為什麼我要去住你們的屋子，我自己就有我的地方、我的屋子」就像那屋子的地契，他等到很久才買回來喔！！他有點抗拒喔!!!…那時候你抗拒也沒有辦法，那都是法令囉！有很多警察在那邊。你不能夠反抗，哪能夠反抗…他那時候壓制下來，也是不能夠講要反抗他。沒有辦法反抗，只能承受囉！（鍾先生 2013）

新村嚴密管制出入，新村周圍以雙層鐵絲網做成籬笆，隔絕內外。以 17 哩新生村來說，整個村子對外的聯絡通道只有最外圍連接成邦江路的大門。在門禁管制上，村民只有在每日早上六點至晚間六點才能離開新村，且村民離開或新村外的人要進來新村都需要被批准才能通行。

後來搬到 17 哩做生意和定居的田先生，在訪談時就提到了新村成立初期，新村內外進出上的不方便：

那時候我們家原本在 22 哩，然後我爸爸在 17 哩做生意，但戒嚴的時候，我和我爸爸就搬到 17 哩來。每天如果要出去都必須要討准證〔進出新村通行證〕…很不方便…像他們住在新村的，就每天要回園還要看警察的臉囉！不能夠大小聲的…因為要求情要每天都要回囉！我們做生意，會瞭解這些嘛！他們每天進出的人，每天都是這樣的東西嘛！有時候要進貨，也是得經過他們去討字〔進出新村通行證〕那些。那時候很戒嚴…那時候要去跟縣長、管這個村的討字。（田先生 2013）

除了進出新村管制區需要再申請特殊准證之外，如果在開放的時間要回去原本自己的田園工作，若是有攜帶糧食也會被官兵特別檢查，以防新村村民將食物偷偷供應給新村外的地下活動的成員。

那時候我們回去 15 哩的園有帶食物都會被檢查，不能帶多多出去的…兵都會在入口那裡一個一個查…而且一開始的時候很苦啊！在園裡的東西都會被偷走，不能每天去看啊！也不能去割樹膠…樹膠得半夜的時候去弄…所以割樹膠的人都不能去了…所以說辛苦啦！那時候真的很辛苦。像我們也是很辛苦，園都沒有做。（官爺爺 2013）

原本是 15 哩人，後來因新村管制被迫舉家搬到 17 哩的官爺爺一家人，就經歷了新村成立初期，每天早上要回去原本 15 哩的田園務農時，因為新村在進出管制上所帶來的不自由。同時，官爺爺於訪談時，也提及了自己在管制初期，親身經歷且讓他仍然感到恐懼的往事：

我那時候我還年輕，我坐那個摩托車，在古晉那邊做，我回的時候，下午五點左右…我跑去七哩那邊，我碰到有一個七哩學生，她跑路喔！跑到 15 哩那邊！她跑錯路了，跑到 15 哩那邊。7 哩到 15 哩，跑到她腳都破了，我上到 15 哩那邊，剛好碰到，我看到拉子小孩就去捉弄她，後來我就停下來，問那個學生說，她都不講話了…在那邊哭。後來我看他的校服，我就知道是 7 哩的學校…後來我問那個女孩子，我說你從哪裡來，她也不會應我，我就想她應該是七哩來的，我就載她回去了。但那時候差不多要戒嚴了…15 分鐘內要回來…我回 17 哩時，已經關門了。警察還問我做什麼，怎麼會那麼遲才回。我和他講，騙他說我做工做比較晚…他就講說，你不能够再這樣晚囉！一下子…警察要走了，他關了門要走了，他有看我來就開門叫我進…他就警告我說，你不能够這樣遲才回了。（官爺爺 2013）

由於官爺爺年輕時擔任政府工（公務員），每天必須往來古晉與新村來回近兩個小時的車程工作。但是政府在新村每日的門禁管制，在當時依然沒有對這些去其他地方工作的新村人在管制時間上特別寬容，相

對地他們被一視同仁。也使得在新村成立初期，不僅那些回到新村外圍務農的村民對於準時回到新村感到焦慮之外，像官爺爺這類必須要到車程更遙遠地方工作的人對於準時回到新村又更為謹慎，深怕一有延誤，就回不了家。不過，在官爺爺於訪談所描述的當天，他基於人道立場，護送了路邊遇到的小女孩回到學校，卻必須面臨回到新村後，管制進出警察的詢問與警告。這也讓他在事件過了 40 多年，依然記憶猶新。

### （三）言論限制

新村建立之後，從不同地方搬進新村的村民們生活雖然日趨穩定，逐漸擺脫剛開始的無所適從。但當地的戒嚴管制強度並沒有因此轉為寬鬆，反而隨著左翼人士出來活動的多寡隨時增強與減低。不僅言論受到限制，在新村裡公開的政治、社團活動也都不被允許參加或成立，更無法享有公民投票的自由。

過往，在管制之前，人們可以自由地在店區的咖啡店高談闊論，無論是談論芝麻蒜皮的閒話，或是三五成群熱烈地討論事情。但是在管制之後，為了杜絕左翼人士在村子裡的活躍，政府對新村村民的言論有了限制。如 17 哩新村的報導人陳先生和鍾先生皆提到了當時新村成立初期在言論自由上的受限制：

像那時候你不能講「毛澤東」…講了被抓啊！那時候跟共產黨有關的東西都不能講，有人就是不小心講到了就被抓走了。（陳先生 2013）

在政府為了剷除異己，造成人心叵測的氛圍之下，在村子裡的公開場合中，無論是簡單不過的聚會或是日常的聊天都必須要處處謹慎和小心。因為這些村民他們沒有辦法知道在村裡商店區的咖啡店跟朋友單純喝咖啡聊天時，身旁的陌生人是不是就是政府派來的線人。在言談中，一有風吹草動，可能就會被線人捕風捉影，而被政府兵帶去問話。

不敢講，那時候很多東西都不敢公開講。怕事啊！如果你在公共場所講話大聲一點就…我有聽到別人講說，有人就在講「我一把鋤頭鋤下去就…起畚箕…」那人家只是在講笑話…但是畚箕和鋤頭是共產黨的標誌喔！因為他們有那個線人嘛！！那個時候我們最怕的就是線人。你不知道啊！就你假如講一句話被聽到，被聽到就完囉！！不是警察聽到，是線人…所以我們不能亂亂講話，因為誰是線人我們不知道喔！不過那個時候我們最怕的是…因為不是有黨派嗎？如果那個時候是反對黨的人，都比較是是左的…那些人我們就比較不會提防他們。但如果是右的，我們就怕了。不過右的很少…所以我們就懷疑那些線人就是右派的囉！（鍾先生 2013）

#### （四）集會限制

甚至新村內戒嚴法令之一的政治、社會活動的參與備受限制，使得村民也無法擁有集會的自由：

那時候都不能夠……最多是你有幾個朋友可能比較熟的啦！

你可以私下講。不然太多人的時候不能講，因為那時候有個「內安法令」，他可以隨時抓你去六哩！那時候完全沒有言論自由，連集會自由都沒有……像如果他要嚴格執行的話，像三個人聚在一起，他就要抓你了喔！不過，他沒有這麼嚴啦！但是那時候真的是「言論自由、集會自由」都沒有…（鍾先生 2013）

因此，在重重法令之下，致使農村社會中人與人間原有的樸實與信任，也被蒙上詭譎的陰影。因為你永遠不知道，是不是有天不小心犯了什麼錯、講了甚麼話，就會被冠上莫須有的罪名。

那都是政治部在查。他們政治部，假如你參過反政府的，他們會了解。那時候就是政治部最大喔！因為那時候政治部的來查。他有很多下線…就好像他接到情報，就去查。可能有的人要害你，就去報你囉！報你就去查，抓去問話囉！因為你不能够亂亂講，可能會害到你自己喔！因為你跟你對方朋友講政治這些，你不知道對方是好人還壞人…要是壞人，他說你講這些東西，你也是被抓囉！（田先生 2013）

甚至若被政府兵發現家中藏匿或是暗中幫助左翼相關之人士，也將受到責罰，嚴重者還有被移送至六哩中央拘留中心的可能。

我不是做那個的，我就知道了。如果他抓到你有藏恐怖份

子，有人家報，他就抓你去打、去監牢。那時也是被抓去監牢的也是很多。因為我們做生意的，他們沒有證據抓我們。

（田先生 2013）

## （五）書寫自白書

在新村的日子陸續又過了幾年，曾經有參與過左翼運動的村民們，即使沒有因特殊罪名被抓到六哩拘留中心，但曾經的所作所為，彷彿揮之不去的印記，任何有關的參與紀錄都被把持在政府的手上。在無能為力對抗政府之餘，「自白書」成為這些左翼人士們保護自己免於受到責罰的武器。

我：所以你們那時候也有寫自白書喔！？

鄧：有喔！

我：他怎麼會查到你有去做這個事情？

溫：就是寫說當時我送信送給誰……

我：然後他就查那些自白書，去看對不對嗎？

鄧：因為你寫的資料，我這樣對一下，就知道了嘛！

我：這樣也不能亂寫喔！

溫：因為身邊的人都講了，只剩下我自己…你想他會不知道嗎？！

我：那什麼時候要寫自白書的？

溫：你如果要清白的話，你直接告訴他…你做什麼東西……

我：他是有了新村之後，就開始叫大家要寫自白書了嗎？

溫妻：沒有差不多有七八年了之後，因為我們結婚就是 73 年結婚的，



是那時候…65年我們參加的…

鄧：問題是你如果之後要參加社團活動…你必須是清白的人。

我：所以他其實是要確認你們的背景是怎樣囉？

鄧：對！

溫：像我們要做甲必丹這些…如果你沒有寫那個自白書，你也無法當。

鄧：他必須知道你的案底，你才可以搞社團，你要申請社團也是…證明你都沒事了，才能去社團的主席，如果他查到你沒寫，就慘囉！

溫：連社團都不行參加了。

鄧：所以逼著你每個有參加活動的人都要去寫，除非你不要活動、不要去搞社團。

溫妻：以前你如果不寫證明的話，你去哪裡都很困難…

鄧：出國的話你更別想了，一定要去自白一下。

溫：像當時要去外面做工的，你也要給我寫好來，才能出去。

鄧：反正就是警察那邊的檔案在交了自白書後，會寫無罪了。

我：也是有人沒有承認嗎？

鄧：他不打算做事，就不用承認啦！

溫：有些人不承認，他也是過平常的生活。

我：可是警察署那裡還是有案底？

溫：還是有，到現在都還有。

我：可是其他這些又不是這麼大的人也有份喔？

溫：有人家說你有做那些事情，你都有案底在那邊的。

（溫先生、鄧爺爺 2014）

報導人溫先生與鄧爺爺皆是住在 17 哩附近的村民，在他們年輕時都參與過左翼運動，在訪談中他們提到，無論涉及左翼運動的程度多寡，政府手中都握有新村內曾參與者的名單。因此，移入新村後的陸續幾年，開始慢慢有許多參與者開始書寫「自白書」，大略的說明自己曾經做過的事情，之後千篇一律再寫上如 1967 年 10 月 30 日於《詩華日報》刊登的前左翼人士鄧子欽自白書的類似內容：

感謝政府給我自新的機會，在此我也呼籲那些仍在活動的地下份子，包括那些仍在邊界活動的武裝份子，應該早放棄無謂的鬥爭，你們的父母、妻兒、兄弟、姊妹、朋友，正盼望你們早日回來，回到自己的家園團聚，共同建設我們的國家馬來西亞。（作者不詳 1967a）

正如同 1967 年與前左翼人士鄧子欽自白書被刊登的同日，另一家砂拉越報社前鋒日報，也刊登了當時尚未入閣的砂拉越人民聯合黨宣教田紹熙針對「自白書」相關內容之評論：

當局似又發大慈悲 釋放十五名拘留者 田紹熙認不外緩和民情 聯盟履行民主應全釋放

當局已於廿八日（星期六）釋放十五名被拘留人士，其中有數人已個別發表了自白書，針對上述事件，人聯宣教田紹熙說，當局釋放十五名被拘留者好像又發了一次大慈悲，但這只不過是緩和民情而已。

田氏還說，這些寫自白書人士所謂大揭露過去非法活動都是千篇一律，並沒有什麼新鮮和驚人之處，這不過是一種招認的「罪名」而作為被聯盟逮捕的證據而已。

我根本不相信犯了這樣嚴重錯誤的人士發表了這樣輕鬆的自白書後，就可使他們的罪名一筆勾銷，這也許是一種恢復自由的重大代價，聯盟政權就可以利用來加強其白色恐怖政策。

田氏希望被釋放的拘留者在做任何對朋友對社會不利事情時應三思而後行，才不會一誤再誤。

田氏最後說，若聯盟政權是自稱履行民主制度的話，那麼必須馬上無條件的釋放所有被拘留者。

對於上述十五名被拘留者獲釋之消息，林金聲亦向記者發表了談話，他說當局此種做法是一種政治宣傳攻勢；寫自白書是否出於內心或過去行為所造成乃不得而知，總而言之，這是他們斷送前程的先聲。

林氏最後說，當局公佈自白書並不使人感到驚奇。（作者不詳 1967b）

田紹熙認為，被拘留者如果真有大罪，不可能憑一張自白書就一筆勾銷；自白書形同出賣同志，反而成為政府遂行白色恐怖的情資。因此田氏一方面提醒同志三思，不要使自己成為不利朋友的證據；同時也呼籲政府全面釋放被拘留者。從這篇新聞以及訪談內容中發現在面對龐大國家公權力之下，多數人往往只能慢慢學會與之共存，卻再也無法像青

春年少時，擁有熱情滿溢去堅持那些他們原本誓死都要維護的理想，於是一篇又一篇雷同的「自白書」隨之出現，因為最終還是得回到那不願面對的現實。

## （六）村外人看新村

新村成立以來，砂拉越當地的報紙便經常有關新村管制區的新聞，無論只是臨時的宵禁通告，或是描述管制區內的生活情形，甚至新村附近與左翼運動有關的事情等等。致使古晉非新村地區的華人，對「新村」的印象很容易就連結到「共產黨」。從目前有限可蒐集到的文獻資料中，最早對三個新村有一專題性而非新聞性的報導可追溯到 1974 年 3 月 24 日砂拉越當地報社《前峰日報》的報導。當時前鋒日報以〈矗立的鐵絲網 新村居民等待回復自由 剩餘的游擊隊出來吧！〉為題，一頁全版的專題包含專文以及數張新村管制大門、鐵絲網、居民生活的照片。內容摘錄如下：

### 新村概況

在轟動國內外的「斯里阿曼」事件中，有一項極令人引起關注和有關人民長期以來，一直在爭取的事情——解放新村。這項願望於首席部長拿督耶谷和北加人民軍總司令黃紀作先生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所簽署的「諒解備忘錄」中，清楚的指出這一點，根據該具有歷史意義的備忘錄顯示，雙方同意在砂拉越地下組織成員全部願意放下武器，跟政府和平共處的时刻，隨即考慮解除新村藩籬，讓新村人民自由。

座落在第一省古晉西連路的新生、來拓、大富三座村落，是砂拉越僅有的地區性限制區。

在地下組織與政府和人民演變成武裝對抗的十一年間，因為局勢的因素，曾有甚多謠傳政府將在本州其他省份或地區建立同類性質新村，但都不是事實，所以，上述三座新村引起人們的關注，對當地人民行動之不自由，莫不寄予同情。

導致建立新村的主要因素，乃於一九六五年六月廿七日一支砂拉越地下組織游擊隊襲擊成邦江路十八哩警察署所演成者，在是役中，當時的首席部長拿督史蒂芬加隆寧甘令弟亦遭擊斃，一齊殉難者還有二名警員。

政府基於局勢的演變，與中央當局一致同意設立新村，打擊砂地下組織實力。所以，政府便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即在一九六五年七月六日正式宣布在成邦江路十七哩、廿一哩和廿二哩建立「鐵鎚行動區」，約束當地人民的行動，試圖切斷砂地下組織的後援……（略）

有關新村內外的人民，倘若離開村外的農耕操作地點以外的地區都必須要申請准證，否則面對法律控訴，對外地區人士欲在村內留宿亦然，在新村建立以來，就有頗多這類觸犯案件……（略）

時值本州之邁向和平康莊大道，全州各族，各階層人民同新村人民一樣希望，限制早日解除。政府已決定，不過仍舊視砂地下成員組織之誠意。因此，人民也同樣希望仍在森林中的殘餘分子，早日返回社會，加速人民要求和平的願望。（作者不詳 1974）

本報導一方面表示對新村居民處境之同情，呼籲早日解除限制，因此在村內小孩放學的照片旁附註「這些天真無邪的小孩在放學後，就要回到鐵絲網的籬笆內，多麼可憐！」，或是放了新生村管制的大門照片，而加註「新生村大門，警察日夜在看守者」。另一方面，則又呼籲森林內的武裝人士早日回返社會，使其新村內的親人可以重獲自由的生活。

媒體中政府的態度，自然而然地左右了局外人對新村的觀感。一般讀者看了這些報導後，接收到的是如果與共產黨有所往來，可能會造成的嚴重後果。如同在田野期間，因緣際會下訪談了一對在 1965 年新村開始管制後，想盡辦法離開管制區搬到古晉的夫妻。這位年約 70 歲的 F 先生提到自己是檳城人，過去因為是軍人的緣故才會被調派來砂拉越，後來又因任務的關係才會到 17 哩附近的 19 哩管制區，也因而認識了原本在 19 哩商店區長大的 F 太太。

在近兩個小時的訪談過程裡，他們時不時就透露出他們對於「共產黨」的恐懼與不願多談。「敏感... 敏感。現在也是敏感，這個敏感就好像是傷風一樣，一個不小心就打噴嚏了！所以這個敏感的東西少跟他接近、少去談他，就沒事了。就是要遠離啦！人家談談談……很少人會要去談。」軍人背景的 F 先生，總是小心翼翼的講著過去的事情，他的態度不同於 17 哩那些參與過左翼運動的村民們，講起往事時總是興高采烈，絲毫不畏懼。對他來說，一切與「共產黨」有關的內容就是敏感的，不經意談論起也許就會惹禍上身。而他所抱持的這種態度，除了在於他原本的身分就是軍人之外，另一方面也是受到政府對「共產黨」長久以來的污名有關。後者這點也往往影響了多數沒有參與左翼運動或是並非身處於那個環境之下的旁觀者所抱持的「共產黨 = 非法」的簡化觀點。

政府不會去宣傳啦！就是會說「共產黨是個非法的！」沒有去直接喊話。就是用報紙、收音機這樣，會說不要跟他們在一起囉！我們遠離他！他跟你這樣講了……報紙也會這樣寫，你如果要跟他們接近，就是你自己找麻煩囉！那時候沒有人要談的啦！人家很怕！你一談啊！談談談……等下兩方面，一個是安一個是寧，你哪裡知道對方是不是共產黨的。所以大家不大喜歡談這個東西，人家坐在咖啡店也不談這些事的。只是收音機報告新聞會講講講這樣。所以在咖啡店人家不會跟你談這些，大家都怕……不然等下人家去政治部那邊 .... 人家不可能去談的。（F 先生 2014）

而 F 太太即使出生的地方就在距離 17 哩約 1 公里遠的商店區，家裡開設雜貨店的她，其實和那些參與左翼運動的 17 哩老一輩新村人的年紀相當，不過她卻沒有因此加入那些當時正蓬勃發展的組織運動。同時在管制區初成立時，她的爸爸直接放棄了原本在 19 哩的商店和椒園，只趕忙去討特別准證，拜託別人讓她和兄弟姊妹搬出管制區，於是在那個紛擾的年代，她就這樣跟原本出生長大逾 20 年的地方，徹底斷了往來。

一家人都搬到古晉的 F 太太，雖然在管制區初期經歷過短暫的無所適從，但相對於後來被迫搬遷至新村受到更多自由、生活限制的其他村民而言，她始終是幸運的。

那時候我爸爸沒有禁到，後來我爸爸才討我們出去的。有！

[住管制區]差不多幾個月啦！後來我就下去了…[那時候]當然會怕囉！你就不好超過時間，如果超過，他就會問東問西囉！我不敢，早早就回了。有人太遲回來的。就看你不順眼的，就抓你去六哩囉！不敢太遲的！…[那時候]很多人想出來。後來就留下來了，住到現在，住在那裡也習慣了。(F太太 2014)

後來到古晉開始新生活的他們，從媒體上不斷得知的新村管制狀態是如此困窘、不自由，其實也更堅定了他們當時拋下一切、選擇離開的決定是正確的。這同時使他們自然而然的覺得，配合著政府的態度，不去與之對抗，或許才能得到最大的幸福，進而獲得政府所期望下的安定。這種和新村居民之間關於地下運動的不同態度，在整個砂拉越，逐漸壓過了新村居民與左翼人士。

### (七) 斯里阿曼協議

斯里阿曼是馬來文 *Sri Aman* 的華文譯音，意謂和平。潛伏於馬印邊界森林裡的游擊隊左翼人士（加里曼丹人民軍）在政府軍的攻擊之下，節節敗退，而印尼蘇卡諾政權已下臺，無法獲致奧援。1973年由加里曼丹人民軍領導黃紀作出面與政府在砂拉越中部的省會成邦江，簽訂和平協議，結束武裝鬥爭，砂拉越歷時多年的左翼運動，至此畫下句點（林煜堂 2009）。<sup>23</sup>

和平協議的簽訂對還身處於六哩政治拘留中心的政治犯而言，是

<sup>23</sup> 成邦江也自此改名為斯里阿曼，只是華人仍慣稱為成邦江。



很大的打擊。年輕氣盛，帶著滿腔熱血誓言反抗政府的青年們，不願書寫自白書認罪者，自然也無法獲釋。然而即使在獄中，他們堅信依舊，仍期待還在森林裡奮鬥的同志們，有朝一日能夠實現砂拉越獨立成功的夢想。1973年斯里阿曼和平協議的簽訂後，這夢想隨之破滅，取而代之的是無盡的失落與無奈。在拘留中心的17哩村民黃爺爺與他的夥伴們，一開始在得知斯里阿曼和平協議簽訂時，並沒有完全相信，反而還抱持著半信半疑的態度，認為這可能是政府為了要讓他們投降、承認他們過去的所做所為而放出的假消息。

一直到斯里阿曼……在那時候我們就知道完了。那時候是收音機有報囉！我們聽了好像是半信半疑…不知道是真是假…覺得可能就是政府放假風聲啊！（黃爺爺 2013）

直到家人來探望後，證實了消息，他們才真正認知到，繼續在拘留中心堅持下去已於事無補。時至今日，隨著斯里阿曼和平協議的簽訂，森林裡的同志們一個個走出森林、放下武器，同時意味著這場在砂拉越歷經近30年的左翼運動也將幻滅。

到斯里阿曼的時候就沒有希望囉！希望都沒有了，你還做什麼？！一個人做什麼，都還是要一個希望的…後來就有時候啦！偶爾啦！三五個人高興的時候〔才會〕談起了…好像他們還是久久有聚在一起，就有聚餐、談談這樣…開心開心…年紀都這麼大了，你再想那些也沒有什麼用了。（黃爺爺 2013）

這一訪談在黃爺爺 17 哩家裡的客廳進行，他講起斯里阿曼和平協議的簽訂以及從拘留中心出來後的過程，完全不同於數十分鐘前他講起抗爭時的風光與無畏無懼，口氣中流露的只有無奈與失望。他提起從拘留中心回到 17 哩的狀況：

做自己工囉！就好像一個傻瓜樣子囉！什麼都不理！每天就是跟妻子一起到園裡做工囉！店裡也幫忙做囉…這樣子就是做平常的一個人了…什麼東西都忘掉它、不要管它了。因為那時候是已經很失望了…怎麼可能不失望…搞到這樣久、這樣多年……付出這麼多心力…後來一點利益都沒有…反而還害到家裡的人。害到自己的太太、兒女，讓他們沒人家照顧…那時候自己也是很內疚啊！（黃爺爺 2013）

拘禁多年之後，重新呼吸到拘留中心外面自由空氣的黃爺爺，就像其他在 17 哩新村的村民一樣，開始過著日復一日辛勤工作與養兒育女的日子。過去那段六哩的生活，好似人生的插曲，無須刻意再提。反之，參與組織活動以及在拘留中心那段時間，疏於照顧家人，滿懷虧欠與內疚之情。這些交雜著自我理想與虧欠的複雜情緒體現於每個於六哩拘留中心出來的政治犯。如同另一位 17 哩村民鍾爺爺，也在從拘留中心出來後，同時又面臨了家中經濟的現實壓力，讓過去身為人聯黨黨員與地下組織幹部的他，自此生活歸於平淡，不再涉入太多政黨活動，專心為家庭付出。

這些公開的就…第一我念少書沒有這樣的才幹和能力，後來我從六哩出來也破產了，沒有事業也沒有園了，我被抓了後，沒有人做、園也荒蕪了。還有兄弟幫忙維持一下……我被關了回來後，起初還是不敢想要怎樣……那時候小孩也才小學而已，後來一班朋友才一起去做建築。我被關了兩年，放出來的時候 28 歲，30 歲才開始做建築。（鍾爺爺 2013）

最終還是回歸家庭的鍾爺爺，歷經身無分文，完全倚靠妻子幫人做衣服，與其他兄弟的幫忙以維持家計的日子後，30 歲的他才開始跟著 17 哩村子出外打工的潮流，慢慢從最基礎的建築工人做起，拉拔家中一個個嗷嗷待哺的小孩長大，也彌補了自己之前被捕時未盡到的責任。

不過，即使想起過去那段歲月時，溫爺爺和黃爺爺，以及多數參與過運動的左翼人士們，情緒中依舊帶著惆悵與無奈，但對於曾經參與過的這些運動與抗爭，他們沒有言語中沒有透露絲毫的後悔，而且仍然堅持著那是件對的事情。

那個是不容易做的，現在你要去做都做不來了。但是那時候整個環境、局勢就是這樣…我們做的這些事情還比有的人來得好喔！我們是光明磊落去做這個事情，是為了解放人類的事業。這是一個偉大的理想…我們去做這些事情，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對。（溫爺爺 2013）

不會錯！我們是正義的！我們不是反人民的，我們沒有危害

人民，這個如果成功，當然對人民是最好的，不成功也沒有大礙。（黃爺爺 2013）

走過 1960 年代的 17 哩新村人其實都明白新村的過去，無論是曾義憤填膺、絲毫不畏懼參與地下活動的左翼分子，或是原本根本不涉入其中卻莫名被牽連進這場風波的村民，甚至還有當年才十多歲對於事件記憶猶新，卻什麼都不明瞭的新村小孩。這些人共同經歷了新村成立的前與後，而那戒嚴管制下的不方便與不自由、政治氛圍下人心惶惶，以及每天擔憂生計、收成的日子，也見證了從荒芭到家園的轉變過程。

## 五、頓挫·新生

距離三個新村成立至今（2015）已 50 年，新村中規模最大的 17 哩新生村，現在那裡可以見到一間大型綜合型賣場、數間銀行，近 400 多家商家，以及每周固定吸引外地商販來擺攤的市集。同時也是這個區域的行政中心，有著農業部、副縣公署、郵政局、警察局、診療所等等公家單位，未來政府還選定在當地設立地區醫院，同時各個蓄勢待發的發展商也將逐一進駐。而 22 哩的大富村因與達雅族聚落鄰近，為當地民眾添購日常用品與糧食的地方，也像 17 哩陸續增添新的發展契機。夾在兩新村之間的 21 哩來拓村，即使村落規模較小，但人口數在近幾年來也大幅提升。

在教育方面，當年新村成立後，確實導致區域內的六所小學與一所中學，僅剩三間還在新村裡的華小（杜明 2008）。重訪舊居，只見中

華公學校門幾乎就要湮沒在荒煙蔓草中，令人唏噓；但是三個新村聚落，各自擁有運作正常的華小，也算順理成章。相同地，在傳統華人信仰方面，目前剛重建完成的 15 哩永真宮，原先是本係搬到 17 哩新村管制區的 15 哩村民的信仰，目前已逐漸成為 17 哩的地方信仰；21 哩於 1991 年建成中央伯公廟，也成了來拓村村民的信仰中心；甚至遷村後仍留在 24 哩的水口伯公，目前也仍然是 22 哩大富村村民的信仰中心。<sup>24</sup> 三個新村內村民的往來通婚，或是三個新村的聯合組織與活動，包含新生村土風舞班、歌唱、籃球比賽等等，這些現象顯示，由於聚落集中與集體記憶，新村已形成緊密的地方感。

曾幾何時，這三個新村早已不是那個需要倚靠胡椒種植的小鎮，更不是那個風聲鶴唳的小延安。若非特別問起，其實沒有太多人記得這裡曾經有的過去，更不會知道原來這熱鬧小鎮的前身，有一段辛苦的歲月。見到當前的繁華，有人會說新村的成立是因禍得福，倘若沒有當時集中的新村，就沒有高密度人口集中帶來的商業發展。甚至在村落中也可能不會繼續保存著河婆客家話、菜粿、釀豆腐與擂茶這類傳統的客家美食。

對於關切馬來西亞新村發展，也留心新村個別差異的研究者而言，新生村自然是 A 級的模範聚落。令人滿意的現況生活，與當年企求顛覆現狀的雄心，形成強烈對比。社會解組之後，重組了，也繁榮了。這

24 水口伯公的地方信仰並沒有隨著 24 哩的華人遷移至 22 哩的新村管制區而有所改變，不過欲將水口伯公遷移至 22 哩的討論也在近年內再次出現。目前兩派意見並存，一派為 22 哩慈善會社為主的信徒，依然持續維持 24 哩的水口伯公廟運作；另一派則據 22 哩村民何先生提到欲將水口伯公遷移至大富村的信徒大部分是相信 2007 到 2009 年每年水口伯公在大富村遊神落童時所表達要遷移至大富村的看法，且水口伯公也在落童時表示自己其實原本就是另一個名為「水德星君」的神，只是在過去 24 哩村民以為祂是大伯公（土地公），而使用了土地公的金身。所以後來在村內相信這類說法的信徒，便開始著手組織與募款，隨後於 22 哩水德星君選定的地方興建新廟，並在 2010 年 10 月完工，成為這一派信徒在大富村的信仰中心。

故事讓人悲傷又無力，悲傷係因為那段強迫遷移、管制與失望的青春夢想，無力則是最終這一切卻意外地以繁榮的生活現況作結。

這個故事以「棄國還鄉」為名，「棄國」意謂放棄了建國的理想，意即砂拉越國族認同之頓挫；還鄉則是回歸社區與現實生活本身。戰士與囚犯最終選擇了「還鄉」，拋棄國族建構的理想，「像一個傻瓜樣子」地回到禁錮的地方社會，開店營生或墾耕糊口，建造了新的家園。於是風起雲湧的砂拉越華人國族認同，既有外在西方國際冷戰為靠山的馬來西亞國家武力壓迫，又有內在地方社會與真實生活本身的召喚，至此頓挫。

馬來西亞華人移民之初對當地原本欠缺認同，大多抱持回歸「祖國」（中國）的態度，華人不把政治與「南洋」的地方聯繫起來，華人的意識是中國的（王賡武 2002: 205）。戰前以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為範圍的南洋文學或馬華文學中，逐漸形成當地認同（楊松年 2001: 33-102；張錦忠 2003: 110）；而砂拉越華人的當地認同，而且是以華人為主體的砂拉越國族認同，則萌芽於日本佔領期間（王賡武 2002: 207）。這期間經由左翼運動者的共產啟蒙，至戰後，先有 1951 年的 1029 罷課學運，隨後砂拉越解放同盟（1953-1965）成立，至 1959 年砂盟促成砂拉越人民聯合黨成立，先前的學運領袖後來成為地下武裝對抗的領袖，甚至砂拉越解放聯盟擴大為北加里曼丹共產黨（1965-1990）（于東 2009: 27-42; 227-241）。換言之，本來僅僅只是萌芽中的砂拉越華人之當地認同，卻以左翼地下武裝運動的形式，表現為激昂的、華人為主的砂拉越國族認同。只是這一國族認同卻因為共產黨而成為冷戰祭品，而這正是 Yong（2006, 2013）將砂拉越客家新村定位為噤聲與犧牲的緣

故。然而這些青年棄國而今髮鬢斑白的戰士與村民，未必純然緘默。

本文田野調查期間，2013年的9月16日適逢馬來西亞成立50周年的日子，這天在整個馬來西亞，無論是馬來半島，或是砂拉越、沙巴各地皆有慶祝活動。慶祝活動前的這幾天，古晉政府機構周邊，乃至各重點道路上，也如8月31號國慶日一般，掛上了州旗、國旗。電視或廣播中，發送著曲調輕快的2013馬來西亞日紀念歌曲。更甬提各家報紙在當天祝賀馬來西亞日的半版宣傳，或是商家以此紀念日做促銷的拍賣廣告。916近幾年才正式成為「馬來西亞日」，相對於831「國慶日」，對砂拉越或沙巴人來說，意義截然不同。對於曾參與過反殖民反大馬運動的華人，916存在著歷史矛盾。「砂拉越福利協會」成員選擇在每年的這一天，在古晉慶祝馬來西亞日。福利協會創立於1974年，主要成員為1960年代因砂拉越左翼運動被政府拘留者。<sup>25</sup>協會正常運作至今，重要的週年慶時，還出版紀念刊物。2011年這些協會曾在古晉省的倫樂縣辦理「慶祝916馬來西亞日研討會暨生活營」，計有來自斯里阿曼省、海口區、倫樂及晉漢省等地近百人參與：

研討會的主賓兼主講人林煜堂博士、砂州前州議員沈楚南伉儷、前北加人民軍最高領導黃紀作、李玉蘭、社區領袖田展耀、許開明、甲必丹陳崇波、甲必丹陳文珍、楊子優、蔡南錦、商界領袖李文光、楊德寶、著名商人楊軒進、曾佛恩、抗日老戰士李亞留上尉、老幹部、老朋友、多名文藝歌唱界

25 砂拉越各地的友誼協會有四，其一為砂拉越福利協會，為砂拉越最早成立的老友聯誼會，成立於1974年，主要成員為牢內老友。其二為晉漢省友誼俱樂部，於1992年3月19日成立，主要是1973年和談回返家園的砂拉越人民遊擊隊老友，部分前牢內和當年地下工作老友所組成。其三為砂拉越中區友誼協會，於1997年成立。其四為美里友誼協會，成立於2003年1月，會員主要是當地從牢內和從部隊先後回返家園的老友（作者不詳 N.D.）。

及會員家屬等人的參加。現場掛滿國州旗及標語，使人感受到歡樂的氣氛。

當天的首個儀式是升國旗、奏國歌，接著由福利協會主席貝雄偉致歡迎詞，並分析國內的政治形勢和提出華社的訴求，作出深入的評析。隨後，林煜堂應邀進行專題演講「歡慶馬來西亞日的省思」，內容包括馬來西亞日的由來、馬來西亞創組的過程、華族對組織馬來西亞的反映與趨勢、大馬華人當自強、大馬憲法規定的重要條文，以及大馬憲法保障砂沙兩州的 20 條契約。許多出席者踴躍發言提問，包括沈楚南、楊錦煥、溫長流、薛維德、陳崇波、李玉蘭及溫三德等人，他們的問題皆獲得林煜堂的圓滿解答。

當晚也在倫樂巴剎舉行宴開 12 席，讓老友們相聚一堂，共享美味佳肴，場面熱鬧。慶祝會的另一高潮是由晉漢省藝康文娛社呈獻的紀錄片《崢嶸歲月》。這是一部反映砂州百年來對殖民主義統治的抗爭史，畫面除了旁述，還有許多真實的遊擊戰士生活鏡頭，令人感慨萬分。此外，主辦單位也備有歌唱表演及猜謎節目等，並由沈欽龍、溫三德、洪梅枝及溫月英聯合主持。他們的幽默風趣，加上嘹亮的老歌、紅歌及山歌在場飛揚，令大家盡興而散。（作者不詳 2011）

這活動的出席者包含當年軍隊最高領導、老戰友、工作隊員與家屬，還包含而今社區與商界領袖，向心力依然。研討會討論的是攸關砂拉越在馬來西亞聯邦地位的「20 條契約」以及播放《崢嶸歲月》紀錄片，



可見念念不忘者仍是當年建國之成敗功過。除了在這樣的場合裡，他們盡情暢談之外，也書寫那段他們創造卻不被重視的歷史。這些書冊以自傳或口述訪談的方式呈現，由砂拉越友誼協會出版，包含《往事》、《林中獵奇》、《悠悠歲月話當年》、《風雨年代》、《砂印邊界風雲》、《回憶 1990 年和平談判》、《心中有個宏大的世界》、《追尋民族區踪跡》和《永遠活在人民心中的人》等等。這些活動與文本，在在顯示當年那被放棄的砂拉越國族認同，一息尚存。

而且這樣的心境並非聚會裡的緬懷與空談而已，在實際的政治中，依舊漣漪陣陣。例如民主行動黨古晉市國會議員張健仁即曾於 2014 年 10 月 14 日在國會下議院參與《2015 年財政預算案》辯論時提出質詢，張氏引述蘇格蘭 9 月 18 日所舉行的獨立公投為喻，表示砂拉越及沙巴跟西馬的關係非常類似蘇格蘭與英國。大部份砂拉越人都認為中央政府忽略和不公平對待砂拉越，促成民間一些強烈排斥西馬的聲音。張氏質問，馬來西亞中央政府是要用什麼方式來看待這些傾向砂拉越自主權的運動。張氏認為，解決砂拉越和西馬半島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問題，最好的方式就是正面和積極處理砂州人民的訴求和怨言，讓砂州策劃自己的發展（聯合日報 2014）。

換言之，砂拉越華人之國族認同雖頓挫於新村與斯里阿曼協議，但至今仍隱藏在華人心中。認同的頓挫對於華人而言，一方面無從擺脫殖民陰影，也連帶地使多族群的馬來西亞國族認同之建構，更形艱難；另一方面則也成為砂拉越州與馬來西亞聯邦交涉的資本。未來新世代華人認同的萌發或不發？會茁壯到何種程度？仍繫於砂拉越內部族群政經結構、外部東西馬關係、全球華人世界的起落與國際強權的合縱連橫，

此時尚難判定。不過，無論如何，它必定左右著砂拉越的整體政經社會文化變遷。

最後，關於東南亞華人研究始終存在一個前典範（pre-paradigm）的討論，競逐者包含華僑（Overseas Chinese）、海外華人（Chinese Overseas）、華人（Chinese）、華裔或華族（Ethnic Chinese）及離散或散居華人（Chinese Diaspora），與此問題共渡四十年的資深研究者最終認為不必用一個特定詞彙定義這複雜的現象，如果要用 diaspora 之類字眼確認華人類型，我們也許不難說沒有單一的華人散居者，但有許多不同類型的華人散居者（劉宏與黃堅立 2002：20）。砂拉越華人之棄國還鄉的往事告訴我們，華人之國族認同被外在的殖民、冷戰與中國崛起等因素牽引，但最終回歸地方社會與真實生活本身。正因為這一回歸，提醒研究者對於各地華人之特殊性，應予更多的描述與分析。

謝誌：本文由第一作者（通訊作者）依第二作者之碩士論文〈「新生」的十七哩：砂拉越客家華人新村的地方感與集體記憶〉改寫，全文以當事者的口述訪談為主要資料，並保留第二作者對當事者的「爺爺」或「奶奶」稱謂習慣。第二作者研究期間承蒙當地余源昌（及家人）、李若芬、溫三德、彭南發、彭南洋、鍾先生、溫民生、鄧日請、謝艾陵、蘇梅生、黃敬生、陳先生、田先生、余秀蓮夫婦、夢羔子、官先生（及家人）、林煜堂（砂拉越大學）、蔡增聰（砂華文協）、貝克民、黃葉時、劉先生、何健華、林傳政（及家人）的受訪與協助，特此一併致謝。同時，感謝兩位匿名審查者不厭其煩地提供主題意識及圖文細節等修改意見，收穫實多，敬申謝忱。

## 參考文獻

- 于東，2009，《砂拉越左翼運動史》。民都魯：余清祿。
- 王賡武，2002，《南洋華人簡史》。臺北市：水牛。
- 古燕秋，2011，〈馬來西亞華人新村的社會與空間變遷研究－以拱橋新村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位論文。
- 田先生，2013，〈當面訪談〉，陳敏萱訪談。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 Siburan 受訪人宅，9月4日。
- 田英成，2012，〈追尋汶萊人民黨——「12.8」政變的真相〉。《東方日報》。<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取用日期：2014年6月13日。
- 甲必丹鄧爺爺訪談，2014，〈當面訪談〉，陳敏萱訪談。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 Siburan 咖啡店，1月14日。
- 作者不詳，1965a，〈成邦江路管制區農人渴望運出農產品出售 商人要求至晉配貨未獲准 居民營養不良因濕氣患病〉。詩華日報，7月14日。
- ，1965b，〈西成路三個新保護村 命名新生來拓及大富——意味擺脫共黨之威脅步向繁榮〉。詩華日報，8月11日
- ，1965c，〈首長召見兩反對黨領袖 闡釋政府所採行動 首長謂管制地區乃共產黨溫床 共產黨及親共居民佔八十巴仙 並警告報章勿發表不效忠言論〉。詩華日報，7月8日。
- ，1965d，〈農業與森林部長張桂生昨指出 西成路十五哩十九哩及廿四哩巴剎將予封閉——政府已選定地點建立新保護村〉詩華

- 日報，8月8日。
- ，1965e，〈管制區內居民 昨日搬入新屋 首長文告呼籲合作防共〉。詩華日報，11月1日。
- ，1967a，〈當局似又發大慈悲 釋放十五名拘留者 田紹熙認不外緩和民情 聯盟履行民主應全釋放〉。前鋒日報，10月30日。
- ，1967b，〈鄧子欽自白書〉。詩華日報，10月30日。
- ，1974，〈新村概況〉。前鋒日報，3月24日。
- ，2011，〈砂福利協會成功慶祝 916 馬來西亞日〉，引自《星洲日報》，9月20日。<http://mykampung.sinchew.com.my/node/157546?tid=52>，取用日期：2013年12月15日。
- ，N.D.，〈砂拉越各地的友谊协会〉。《柔佛州老友聯誼會》。[http://laoyou.org.my/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79:2011-05-24-13-05-16&catid=28:2011-05-24-13-02-20&Itemid=22](http://laoyou.org.my/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79:2011-05-24-13-05-16&catid=28:2011-05-24-13-02-20&Itemid=22)，取用日期：2015年7月30日。
- 李盈慧，2004，〈海外華人認同的三種論述：評顏清滄、古鴻廷、王賡武的三部著作〉。刊於《臺灣東南亞學刊》，第1卷1期，頁101–104。
- 李婆婆，2013，〈當面訪談〉，陳敏萱訪談。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 Siburan 受訪人宅，8月23日。
- 杜明，2008，《砂拉越晉漢省華校春秋》。古晉：萬里印務。
- 周丹尼，1990，《砂勝越鄉鎮華人先驅》。古晉：黃順柳（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官阿姨，2013，〈當面訪談〉，陳敏萱訪談。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

Siburan 受訪人宅，10月8日。

林廷輝、宋婉瑩，2000，《馬來西亞華人新村50年》。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

林煜堂，2009，《江河浪淘沙：砂拉越大時代兒女情懷》。砂拉越：馬聯。

張錦忠，2003，《南洋論述：馬華文化與文化屬性》。臺北：麥田。

陳先生，2013，〈當面訪談〉，陳敏萱訪談。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

Siburan 受訪人宅，8月31日。

陳偉玉，2010，〈東馬華人與馬來西亞聯邦之組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論文。

陳敏萱，2014，〈「新生」的17哩：砂拉越客家華人新村的「地方感與集體記憶」〉。新竹：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碩士論文。

陳鴻瑜，2012，《馬來西亞史》。臺北：蘭臺。

彭先生，2013，〈當面訪談〉，陳敏萱訪談。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

Siburan 受訪人宅，10月9日。

黃爺爺，2013，〈當面訪談〉，陳敏萱訪談。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

Siburan 受訪人宅，9月5日。

黃爺爺，2013，〈當面訪談〉，陳敏萱訪談。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

Siburan 受訪人宅，9月5日。

楊松年，2001，《戰前新馬文學本地意識的形成與發展》。新加坡：八文文化。

楊詩評，2006，〈從後殖民角度探討馬來西亞的國族論述〉。臺北：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溫先生、鄧爺爺訪談，2014，〈當面訪談〉，陳敏萱訪談。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 Siburan 咖啡店，1月14日。
- 溫爺爺，2013，〈當面訪談〉，陳敏萱訪談。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 Siburan 受訪人宅，1月25日。
- 溫爺爺，2013，〈當面訪談〉，陳敏萱訪談。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 Siburan 受訪人宅，9月4日。
- 鄒雁慧，2007，〈馬來西亞華人新村文化景觀的變遷：增江新村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學位論文。
- 夢羔子，2011，〈鼠患〉。轉引自《拉讓盆地文學部落》。<http://kamunasiwa.blogspot.tw>，取用日期：2012年10月30日。
- 劉子政，1996，《砂拉越百年史略》。詩巫：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
- 劉宏與黃堅立編，2002，《海外華人研究的大視野與新方向：王賡武教授論文選》。NJ, USA: Global Publishing（八方）。
- 潘婉明，2005，《一個新村，一種華人？重建馬來（西）亞華人新村的集體回憶》。臺北：海華文教。
- 蔡靜芬，2013，〈「舊娘」？「新」娘？馬來西亞砂拉越客家社群的婚姻儀式及女性〉。臺北：遠流。
- 盧友愛 編，2012，《漫漫求索路——北加里曼丹革命四十年探討（1950-1990）》。民都魯：北加里曼丹革命40周年探討編委會。
- 聯合日報，2014，〈健仁國會談砂自主權運動 質問公投還是鎮壓〉，《聯合日報》，10月16日。<http://cnews.cari.com.my/news.php?id=669951>，取用日期：2015年7月10日。
- 饒尚東，1995，《東馬客家移民史略 落地生根：海外華人問題研究文

集》。詩巫：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

顧長永，2009，《馬來西亞：獨立五十年》。臺北：商務。

Chang, Pat Foh, 2008, *History of Kuching City in Sarawak*. Kuching: InfoGrafik.

Chin, Yee Mun and Y. F. Chang, 2015, 'Categories of New Villages in Malaysia: A Review.' In *2015 Presentation of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CTU*, 2015/11/14, Hsin Chu, Taiwa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Cribb, Robert and Colin Brown 著、蔡百銓譯，1997，《印尼當代史》。臺北：國立編譯館。

F 太太，2014，〈當面訪談〉，陳敏萱訪談。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受訪人宅，1月17日。

F 先生，2014，〈當面訪談〉，陳敏萱訪談。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受訪人宅，1月17日。

Shamsul, A. B., 2001, "A History of an Identity, an Identity of a History: The Idea and Practice of 'Malayness' in Malaysia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2(3): 355-66.

Skeldon, R., 2003, 'The Chinese Diaspora of the Migration of Chinese Peoples?' In Laurence J. C. Ma and Carolyn L. Cartier eds., pp.51-68. *The Chinese Diaspora: Space, Place, Mobility, and Identity*, Oxfor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St. John, Spenser Sir, 1863, *Life in the Forests of the Far East; or, Travels in Northern Borneo, Vol. 1*, 2nd ed.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Yong, K. H., 2006 'Silence in history and nation-state : Reluctant accounts of the Cold War in Sarawak'. *American Ethnologist*, 33(3): 462-473.

———, 2013, *The Hakkas of Sarawak: Sacrificial Gifts in Cold War Era Malaysi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附錄

### 受訪者說明

曾參與左翼運動者			
報導人	年齡	性別	簡要背景
1. 溫爺爺	71 歲	男	五歲時搬到 17 哩，後參與左翼運動，而被捕入拘留中心。現在還繼續住在 17 哩。
2. 蘇爺爺	80 歲	男	原本不是出生在在 17 哩，只是父親在 1960 年代即在 17 哩買房子。 後來因參加人聯黨，接濟左翼人士，而被捕入拘留中心。離開拘留中心後，才搬到 17 哩住。
3. 鍾爺爺	70 歲	男	原本為 16 哩人，參與左翼運動被捕入拘留中心。後來因新村管制才搬到 17 哩住，現在還繼續住在 17 哩。
4. 余婆婆	70 歲	女	出生雖不在 17 哩，但父親於她 8 歲時舉家遷移到 17 哩做生意，後來一直住在 17 哩，並曾參與過左翼運動。
5. 李婆婆	68 歲	女	在 17 哩出生、長大，也嫁給 17 哩人。20 歲時順應 17 哩潮流參與左翼運動。
6. 黃爺爺	80 歲	男	原本為 15 哩人，從年輕時即熱烈參與左翼運動，後被捕入拘留中心。因新村管制才搬到 17 哩住，目前也繼續住在 17 哩。
7. 溫先生	62 歲	男	現為當地地方領袖，為 22 哩人，曾參與左翼運動。
8. 鄧爺爺	70 歲	男	現為當地地方領袖，為 21 哩人，曾參與左翼運動。
未參與左翼運動者			
1. 彭先生	60 歲	男	出生在 18 哩，1950 年代末期，政府為開發 17 哩，而將 18 哩商店遷移至 17 哩。所以他們全家開始搬到 17 哩住，並經歷了新村管制時期。
2. 官爺爺	76 歲	男	原本是 15 哩人，因新村管制搬到 17 哩。
3. 官阿姨	約 70 歲	女	原本是 15 哩人，與官爺爺是兄妹，所以也在新村管制時搬到 17 哩。但之後嫁給別的地區的人，所以住了一年後搬出新村。
4. 陳先生	60 歲	男	原本是 15 哩人，因新村管制搬到 17 哩
5. 田先生	60 歲	男	原本是 22 哩人，因小時候跟隨父親到 17 哩做生意，後來在新村管制後住在 17 哩。
6. 鍾先生	56 歲	男	原本是 18 哩人，後因新村管制搬到 17 哩
其他和新村及左翼運動相關問題之報導人			
1.F 先生	70 歲	男	過去為 21-22 哩之間住民，未曾參與左翼運動，約 1965 年成立管制區後搬離。
2.F 太太	70 歲	女	過去為 21-22 哩之間住民，未曾參與左翼運動，約 1965 年成立管制區後搬離。與 F 先生為夫妻。

附註：表列年齡係 2013 本文田調之時受訪者的年齡。

